岁月的碎片

一个漂泊者的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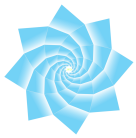
金山凡人

2026-04-19

© 2017 - 2026, by me, aka 金山凡人.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ortion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permission from me, except as permitted by U.S. copyright law. For permissions please contact:

shiluciyuan@gmail.com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手工、图片、电子、机械或其它方式）复制、复印、翻译此文档的任何部分或与其它任何资料进行合并。有关申请可电邮至上述邮箱。



2026-04-19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以及我生命中所有的老师、同学、朋友与亲人。

“Like all young men I set out to be a genius,
but mercifully laughter intervened.”

“少年曾许凌云志，幸有笑声阻我狂。”

—— 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重奏》
（*The Alexandria Quartet by Lawrence Durrell* [1]）

[1] 英国海外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旅行作家。生于英属印度贾朗达尔，逝于法国（1912 年 2 月 27 日—1990 年 11 月 7 日）。代表作有《亚历山大四重奏》、《苦柠檬之岛》等等。

目录

自序 7

第一部分　流年与命运 8

第一章　零星小学片段 9

第二章　另类高中岁月 11

第三章　大学的情事 14

第四章　七分闯世界 16

第五章　名字响起来 18

第六章　恋自桃花源 20

第七章　命运的岔道 22

第八章　千禧年股灾 24

第九章　继续往西飞 26

第十章　波斯到硅谷 28

第二部分　禁与惑之间 30

第十一章　手抄本时代 31

第十二章　第一次触碰 34

第十三章　滇池的绿叶 36

第十四章　冷海与热酒 38

第十五章　艳书收藏者 40

第十六章　合法的大麻　42

第三部分　远方的风向　44

第十七章　森林里的温泉　45

第十八章　月下硅谷作家　47

第十九章　硅谷签证小店　49

第二十章　欠税的工程师　51

第二十一章　湾区彩虹故事　53

第二十二章　乌干达的爱憎　55

第二十三章　蠢乃道德缺陷　57

第二十四章　沙漠中的火人　60

第二十五章　无家可归危机　62

第二十六章　小心异地奇法　64

第四部分　落叶的余温　66

第二十七章　妈妈的黄昏　67

第二十八章　早夭的腊弟　69

第二十九章　异乡的送别　71

第三十章　不忘旧师恩　73

第三十一章　东京的故人　75

第三十二章　二战的纪念　77

第三十三章　海格特墓园　79

第三十四章　落叶的秋天　81

自序

这些年，走南闯北，飘洋过海，细数多年事，八处过中秋。看过无数风景，见过众多人事，侃过星辰大海。有的人擦肩而过，转身便再未相见；有的人一眼远瞥，心底却留下一道印痕。

时间久了，记忆就像散落的贝壳。有的被浪花打碎成沙，有的仍在阳光下闪光。每一片都藏着故事，轻拾便有余温。

回望来路，总觉得人生百态，趣味横生。有喜有悲，有笑有泪，川湘粤苏俱尝，酸甜苦辣全品。于是，便有了这个生活小故事的合集。既是记录，也是回望；既是叙述，也是自省。算不上什么文学作品，只是想定格那些让我心头一动的刹那。

这些故事，就像岁月的碎片。有的温暖，有的尴尬；有的真诚，有的荒诞；有的令人莞尔，有的让人沉思。有的发生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有的停留在国内城市的饭馆；有的响在校园走廊的回声里，有的飘在旷野森林的过风中。它们记录了文化的碰撞，时代的起伏，也蕴藏着某个个体默默成长的纹络。

然而，这些故事不全是真的。有的假，有的真；有的真中有假，有的假中有真。有的来自我生命的片段，有的只是灵感的火花。我喜欢把记忆和想象混在一起，让虚构的故事沾染上生活的尘埃，也让真实的回忆带上一点梦的色彩！

毕竟，人生哪有那么分明？有时真事听起来像假的，有时梦反而更真实。而我，不过是个漂泊者，写下我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甚至所梦的那些瞬间。

希望你能在这些故事里，找到一点共鸣，觅得一丝笑意，或在某个片段里，看见自己的影子，回溯星光的本源。

Part I

流年与命运

命运从来不是一张摊开的地图，而更像掌心那些看似杂乱却自有方向的纹路：你以为自己在选择，但常常是在被引导；我们跌跌撞撞地去爱，也笨手笨脚地成长，以为所有相遇都必然，以为命运都是听得见的轰鸣。你以为是偶然，却又会在多年之后恍然明白那是必然。我们行走在半明半暗的道路上，用猜测对抗未知，用勇气回应不确定。回头看，每一次偏移、每一次停滞、每一个突如其来的转弯，都悄悄在生命里刻下一道纹理，验证了一条墨菲定律，拼成了一个谁也提前读不懂猜不到的故事。

1

零星小学片段

部 I

事实上，我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正常的教育轨道”有些错位。

我在小学一年级就辍学了——如果“辍学”这个词，用在一个四岁的孩子身上还算合适的话。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穿着新衣服，正式走进小学课堂。开学那天，我和其他孩子一样，背着书包，排着队一起去的学校。第一节课结束后，我误以为当天的学习已经完成，便理所当然地、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独自回了家。

事情本可以就此结束。但邻居家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比我大几岁，他半开玩笑地吓唬我说：因为我提前离开，老师一定会找我麻烦，甚至会惩罚我。那番话对一个四岁的孩子而言，分量太重了。我被吓坏了，从此心生恐惧，那一年里，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一步。

也正因为如此，小我一个月的表弟反而比我早一年正式入学，而我则在学龄线上被悄然延后了。

第二年重新回到校园，日子便这样一天天过去。学习内容在今天看来枯燥而单调，但身边总有同学和朋友围绕着，尽管没有玩具或任何娱乐设施，我们依然能在操场、田埂和放学路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那段时光，简单，却并不乏欢笑。最棒的是，我结识了很多终生的朋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如今再回头看，那段时光的大部分细节已经模糊不清，像被水慢慢冲淡的字迹；但仍有一些画面，却始终挥之不去，牢牢地留在记忆深处。

其中之一，便是“忆苦饭”。

前一天，老师会郑重其事地通知我们：每个人回家准备一把米、一把勺子和一个碗。第二天，我们把这些东西带到学校，将米交给老师。到了中午，所有人的午餐便是一碗热粥，粥里只放了少量绿叶蔬菜和盐。

吃饭之前，或吃饭的时候，学校还会请来几位老人，让他们坐在我们面前，讲述过去的生活。他们往往会痛陈解放前的苦难，控诉旧社会的黑暗，同时尽情赞美解放后的新生活。整个仪式的目的很明确——是要让我们明白，这样一碗清粥究竟有多“难吃”，从而懂得今日生活的来之不易。

但对我们来说，这种教育多少有些“走样”。我们的家乡是洞庭湖滨典型的鱼米之乡，家中饭还是吃得饱的，这样的清粥在家里反倒不常见。结果，我竟然觉得那碗粥并不难吃，甚至有些喜欢。这种真实的感受，与他们预设的教育效果显然背道而驰。

类似的活动，几乎每年都会举行一次，直到我上了初中，才悄然消失。

另一件至今回想起来仍带着荒诞意味的事情，是一年一度的“抓特务”游戏。

据说，有一名“间谍”跳伞降落在附近的甘蔗地里，我们学校接到任务，要协助抓捕。于是，全体小学生被动员起来，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当作红缨枪，围绕甘蔗地展开地毯式搜索。孩子们屏息凝神，四处张望，随着“搜索范围”的不断缩小，最终总能把“特务”找出来——而

这个特务，通常是由老师乔装扮演。

当时我们并不觉得这是表演，只觉得这是一次严肃而重要的任务。

然而，童年的记忆并非全然轻松。悲剧也曾真实地发生。我们的小学靠近一条自然河流和一条人工运河，偶尔会传来学生溺水的消息。这样的事件，像一块阴影，短暂却沉重地笼罩在学校的空气中。这也是造成学校易名迁址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老师中，有超过三分之一是“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1]。他们多是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国营农场的年轻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被迫离开城市，却意外地改善了农场学校的师资结构。这些知青教师大多沉默、克制，却极其认真。他们的奉献并不张扬，却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

多年之后回望，那些看似零散、甚至荒诞的片段，其实正是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注脚。它们并不宏大，却深深嵌入了个人生命的底层，成为无法剥离的背景音。

几年前，我回到了当年上小学的地方，想看看记忆中的一切是否还在。可站在那里，我几乎认不出那片土地了。周围曾经熟悉的居民早已迁走，昔日人声鼎沸的村落不复存在，连那所承载了我最初记忆的学校，也早已消失无踪。

最早的学校旧址，如今变成了一片九原墓地。坟茔静静排列着，仿佛在替时间安葬那些无人再提起的日子。我站在原本应是操场的位置，却怎么也无法把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孩子们奔跑、呼喊的画面重新拼合起来。就连那条曾经在夏天泛着水光、陪伴我们上下学的河流，也只剩下原来的一半宽度，水势收敛，岸线后退，像是被岁月悄悄削去了一截。

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意识到，变化从来不是缓慢发生的。它总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等你回头时，世界早已换了模样。许多地方、许多人、许多故事，并不是逐渐远去的，而是直接从现实中消失，只能在记忆里勉强留下一点轮廓。对我而言，那片土地不只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更是一段无法复返的童年；而它的消失，也让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感受到时间的力量——安静、彻底，却不可逆转。

[1] 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许多合格教师稀缺。城市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其中一部分被安排到乡村学校担任教师，填补了师资空缺。对许多农村孩子而言，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教师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成为他们求学路上的幸运。总而言之，知青教师是“上山下乡”运动中一支特殊的教育力量，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是教育奉献者，也是时代洪流中的普通人。

2

另类高中岁月

部 I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高中时代像一段被时代洪流反复折叠、压缩、撕裂又重新拼合的记忆。那是一段动荡得让人难以相信的青春，不仅因为我个人的命运在摇晃，更因为整个国家同时在剧烈震荡。当我把自己的经历摆回到当时的国家背景里，就能明白为什么一切看上去那么仓促、混乱，又带着一种命运逼近门前的突然。

1977 年，13 岁时我升入三分场中学的高中部。学校其实还是那个学校，只是教室移到了另一栋而已。能够进入高中，在当时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权利——高中招生仍然要靠群众推荐[1]。说白了，我能被选上，带有不小的好运成分。只是那时候的我根本意识不到这种幸运有多金贵，我始终天真地以为：人生会顺着某条既定的轨迹往前走，现在只要认真读书。

学校的变化也静悄悄地发生着。两年前它还是一所普通初中，如今升级为高中。前两届一共只有三个班，我们这一届按顺序编号到了高四、高五两个班，我被分在高五班。刚入学那阵子，一切都平静得像一张被轻轻擦过铅笔灰的草稿纸，规矩、严肃、标准的中国式校园生活，一切都井然又乏味。那种平静安稳得让人觉得连记忆都懒得为它做一张书签。

唯一的一点“波澜”来自某个奇怪的学生恶作剧。传闻中牵扯到班主任的私生活，对我这样的安静学生来说，那件事更像一团退不开的雾。我站在雾里面，听不见真正的声音，也搞不清大家究竟在嘀咕什么，只隐隐觉得世界有那么一瞬间变得陌生、躁动，让人心里发凉。

但真正的巨浪不是从教室之间窄窄的走廊里卷来的，而是来自国家层面的一纸文件。

1976 年，四人帮倒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像从十年的漫长噩梦中缓慢醒来。

1977 年，中国教育迎来了二十年来最惊心动魄的转折[2]。当年八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宣布——恢复高考，恢复统一招生，择优录取。这条消息传到我们那个小地方时，所有人都像突然被一束刺眼却温暖的光照亮了：学生、老师、家长、知青、返城青年……大家忍不住往那光里靠。

这不是一条普通政策，这是一个可能改变整整一代人命运轨迹的通道。

弱光之下的人们第一次看到出口。

那年 11 月，全国五百多万人报名参加恢复后的第一次高考。那个冬天，整个国家都像久旱后的土地，拼命吸水。那是第一次，命运在人群中真实、无声地向我们挥手。我们突然明白：高考不是新闻纸上的词汇，它正在敲响我们教室的门。

---

1 我们原本有三个初中毕业班，加上来自另一所学校的一个初中毕业班，一共四个初中毕业班，最后组成了两个高中班。估计至少有近三分之一的人没有上高中。

2 1977 年 8 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10 月 12 日，国务院以国发〔1977〕112 号文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决定从 1977 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采取自愿报名，各省自行命题、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5 日，全国约有 570 多万人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其中 27.3 万人被录取。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郭沫若说：“科学的春天已经来临。”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不仅是号角，更像是一个时代的宣告。

而我的高中生活，自那之后，被彻底改变了方向，也充满了波浪起伏。

现在回头看，我其实只上了半年的“正常”高中课。1978 年初，因为学校认为我和已故的金山[3]同学“有希望”（或者提前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实战练习？），便把我们两人抽离原班，编入 78 届高考备考班。

那段日子苦，却也纯粹。宿舍不够住，我们向年轻教师罗老师借住了一张床，从四月起，我们三个人挤在他那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住了整整三个月。那间狭窄却温暖的房间，后来成了我记忆中对“帮助”最早也最深刻的定义。非常感谢罗老师！

1978 年 7 月 20—22 日，第二次全国统一高考举行了，这是中国重新站起来的时代步伐，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撞向命运的大门。

我们当然没考上。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的任何分数！不仅如此，除了学校那位年轻的英语老师，一个从知青点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她参加了高考被顺利录取外；历届的生源加在一起，全校只有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生被扩招补录。那一年的绝望与期待交叠在校园里，像在空气中同时漂浮着热气与霜。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于是，我们又回到学校，继续以 79 届学生的身份读书。这一次，教室里坐着的是被重新组合的“冲刺班”，高六班：77、78、79 届的学生，加上还想再次敲门的其他人员，全部混编在一起，只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高考。

然而，时代的节奏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快。

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开始大力推动各类竞赛，数学竞赛首当其冲。1978 年 9 月，农场举办了第一次数学竞赛，我在八个高中近三十名学生中意外地拿了第三。随后我们三人代表农场参加岳阳地区的竞赛，我又更不可思议地再拿了第三！

那是我第一次感到别人不只是看见我，而是对我抱有“期待”。学校甚至破例给了我“自由学习时间”。按理说，我应该把这当成改变人生的通道。但青春的本质就是不懂得珍惜而无所谓的消耗。篮球在那段日子里比数学更吸引我，我把大量时间花在球场上，听着球落地的响声比任何习题都更让我兴奋。1979 年首届省级数学竞赛，我默默无闻，成绩和名字一样无声消失在名单之外。然而命运偶尔并不遵循轨迹。1978 年底，我以数学竞赛成绩参加了岳阳地区首届科学大会，还拿了先进个人奖[4]。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可能走出农场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为了提高农场整体升学率，延续七八年高考集中复习的操作，当年的农场在全场范围调集资源，遴选老师，考试学生。于一九七八年十月在层山中学聚集了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近百名学生的集中培训，仿佛临时打造了一所“重点中学”。一九七九年春节后，我也被吸纳进入理一班继续备考。

那段日子像被时间浓缩过，四周每一块空气里都弥漫着紧绷的焦灼，也带着决心的气味。正如我几年前在另一篇回忆录中所写：“整天两点成一线，吃饭睡觉上教室。除了课间休息时间聊聊天，没有任何社交活动。无可置疑的枯燥乏味、单调无趣。正是这份心无旁骛使七九年的我们充满生机、富有理想、昂扬向上。阅历虽然有限，梦想也很简单，精神确是可嘉。在那一个以梦为马的年代，求知若渴最能体现我们的状态。把豪迈藏在了心里、热情则面向了知识。”

---

[3] 金山同学选自高四班，所以当时是每个班挑了一个同学。

[4] 1978 年 12 月 1 日岳阳地区首届科学大会召开，大会制定《岳阳地区 1978～1985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表彰奖励 83 个先进集体、162 个先进个人和 317 项科技成果。

“高考之际，那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年代，不但有紧张也有悲情。令人心痛的是在关键时刻，三分场两位同学分别失去了至亲！真是伤痛难以言喻，生命倍感脆弱。万幸她们擦干眼泪，放下痛苦，坚强地走了出来。”

终于，在 1979 年 7 月 7—9 日，我参加了第二次高考。那年三个班共 126 人，108 人上线——第一次整体超越岳阳市一中[5]。后来老师们谈起那一年时，眼睛里都有一种几乎难掩的骄傲。

而我——也在这 108 人之中，从水浒上岸了！

我终于进入了大学！留下的是从高考独木桥上跋涉走过的步履蹒跚的青春身影！

现在回望，那几年几乎不像普通人的青春，更像是一场被国家洪流卷入又托起的历险。我们在时代巨大的呼吸声里跑着，偶尔摔倒，偶尔迷失，却始终被某种力量推着往前走。“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高中生活并不诗意，不浪漫，甚至常常是混乱、困惑和疲惫的[6]。但它充满着一种朴素又坚固的力量。它第一次让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命运，有时候并不是由自己慢慢走出来的——它可能在某个历史瞬间，被国家、被时代、被一纸决策、被重新打开的一扇门突然改变方向。

而我——恰好站在那扇门要打开的地方。

毋庸置疑当年老师的爱岗敬业和严慈相济给了我们极大的关爱和帮助，我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无私奉献和无悔付出，也非常荣幸他们是我生命历程的参与者。没有他们，我走不到今天，也不可能看到地平线以外更多的缤纷世界！

这份幸运，我一生都记得。三分场和层山的老师同学们，谢谢！

---

5 引自理一班班主任龚老师夫人叶老师回忆。点击原文：https://www.meipian.cn/25dagksc

6 两年的高中，我读了两个学校，待了四个班，住了五个宿舍，中途还因各种原因没有上课。

3 大学的情事

部 I

坐在桌前，翻开手提屏幕，倾上一杯红酒。把记忆倒带到 N 年前，才发现这个题目我没法交卷。往事历历，似乎都离情很远。至少那时候情不在我的视野，也许还在那遥远的地平线之外；或者情还没有发现我，我也没有发现它！但为了这个作业，只好东拉西扯，取巧牵强了。

大学四年，我从一个 15 岁的懵懂少年变成了 19 岁的“知识青年”。除了没学好专业，啥都学了。有点悲哀！后来为了考研究生，只好从头背书，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那时候我醉心图书馆，几乎每天都有一书在手，当然无一是专业著作。三刻五拍，隋唐野史，遍览各卷；莎氏戏剧，孤独百年，都曾入眼；明清章回，是我最爱。杂志阅览室，更是常客。每天早早在门边就是为首先拿到想看的期刊。四年后期，兴趣更是转到了读英文小说。因为单词量太少，只好从简写本开始。记得有本间谍小说《39 级台阶》[1]，非得一气读完才罢。

现在想来，当年阅众多书，其中也不泛露骨之处，性冲动肯定是有的。只是没有从潜意识上升到显意识，所以求偶的欲望是从没有浸上心头。至今跟我小孩谈到这个还引以为憾，大学期间未曾恋爱过，人生一大缺失啊！哈哈哈！

当年所涉虽然甚广，但大多是过眼烟云，左进右出了，没有留下太多的痕迹。唯有两技一直伴随我几十年，身心觅得不少快乐。

其一是足球，不知道何时开始的。在学校碎石处处的操场上留下了不少血汗。至今我的膝盖都是伤痕累累的。到美国还每个星期玩一次，在经历了好几次球友操场救护车后，终于在 2005 年洗脚离场而进了健身房。

其二是围棋。这是我大玩桥牌之前的恶好了。因为可以狂饮醉弈，常常是酒足饭饱之后的娱乐首选。这也在 2006 年金盆洗手，悬盘求静了。

说到围棋，我们班应该感谢已在天国的刘同学。他来自巴蜀之地，抵校之时，已沫棋风。是我班当时唯一既拥棋具、又购棋书、颇有棋识的“专业人士”。他启蒙了我们围棋众生，使大家在十九方格之间悟到了方圆与黑白的快乐。上帝保佑他，RIP!

我的“情事”就与刘君有关。这是我大学四年唯一一次半拉半推接触到的情感氛围。既不明来历，也不知结果，对过程更是兴奋又好奇！

那应该是四年级的时候。一天刘君找到我，要我帮一个忙。我当时二杆子精神，毫不犹豫一口答应了。他才给我交待了一些源由。他喜欢上了一个川妹子，想认识她交流。忘记是那个系的了，下围棋的可能都知道，当时的女子围棋第一人。

他当时一定做了不少前期工作，姓名、宿舍、室友都能一一道来。我的任务就是把他的一封信递到目标美女的手上。他设计的路线是我先交给我们班的牛美女，然后由牛美女（曾记否？[2]）转给目标美女。似乎是牛美女与目标美女一个宿舍或者经常一起打羽毛球（？）。

---

1 《The 39 Steps》似乎是根据希区柯克同名电影改编的小说

2 她真的不记得了。很正常，这个于她是小事，于我中事，于刘大事。

总之，我按刘君的意愿，把信给了牛美女，然后拜托她转交。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他自己不交信，我也不知道答案。性格使然?

这是我大学四年对于情感的唯一触及。说是情事，不如说是无情了事。

今天写下这些旧事，一者缅怀刘君，二者记录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三者抛砖引玉，期待大家放开心扉[3]。

[3] 此为大学时代回忆录《我的情事》闲聊第一题所作，本意大家都回忆那四年任何与情有关的事。现收录于此，供读者一笑。

4 七分闯世界

部 I

我这一生的求学时间相当漫长，据我所知，远比大多数人都要长——严格地算起来，一共是二十二年。在大学之前，我上了九年半的学，包括五年半小学[1]、两年初中和两年高中[2]。之后，我又读了四年大学，三年硕士，五年博士，加上大学毕业后的半年脱产进修，总计在学校混了正好二十二个年头。

在这漫长的求学生涯中，我参加过无数次考试。从班级考试到省级比赛，有些轻松，有些艰难，有些我毫不在乎，有些我倾尽全力。但每一场都在悄悄塑造着我的学习方式和思维习惯，有的则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然而，奇怪的是，经历了这么多考试，我真正记得分数的，却只有两次——而且偏偏都是英语成绩。

第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高考。总体来说，那次考试我考得还行。但真正刻在我脑海中的，却只有英语这一科：我得了七分（满分一百分），其他所有分数都随风而失了。所幸当年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否则我恐怕连大学大门都迈不进去。尽管如此，那份“七分”的醒目数字仍然让我深刻认识到：原来我当时的英语水平，糟糕到如此地步。不过，高考却是决定命运的一役，它为我打开了大学的大门，也因此奠定了日后所有可能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次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大学期间，我并不是一个任何意义上的“好学生”。那时的我沉迷于文学，把大量时间花在阅读上，从中国古典小说到翻译的外国小说，几乎所有能找到的作品我都读了个遍。等到中文书读得几乎乏味时，我开始尝试阅读英文小说，尤其是那些为英语初学者编写的简化版读物。回头来看，这个偶然的选择竟为我后来学习英语、适应英语世界奠定了关键基础。

真正让我英语突飞猛进的，是我在研究生院读硕士的时候。那里的学术氛围浓厚，学生们学习英语的热忱更是令人惊叹。我很幸运，我的英语课老师是一位刚从哈佛毕业的美国华人，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发音如此纯正的美式英语教师[3]。在她的课堂里，我的听力和口语能力有了质的飞跃，阅读的广度也不断拓展，接触到了更加广阔、真实的西方文化世界。

从那时起，我保持着阅读英文的习惯。除了阅读专业英语书刊之外，尤其喜欢翻阅美国大众刊物《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4]。幸运的是，我们研究所的图书馆收藏了近三十年的这些杂志，于是我干脆把它们全都读了一遍。“男儿须读五车书”！那是我闲暇时的阅读材料，尤其是在睡前，我会坐在床上阅读一个小时。这些阅读不仅提升了语言能力，也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与更丰富的人生可能性。

随后，我迎来了第二次让我终生难忘的英语考试：托福（TOEFL）和 GRE（研究生入学考

1 在中国，小学通常为六年制，但在那时期，正是实行冬天开学到秋季学期的改变。

2 不，我没有接受 12 年的教育！

3 我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们的英语班是由英语母语者执教，其他的英语班都是由中国老师执教的。

4 来到美国后我才发现，这些期刊或多或少都属于左翼政治阵营，在过去的十年里，它的确展现出了非常明显的进步主义（Progressive）倾向，虽然《读者文摘》在历史上曾被认为是保守派的阵地。

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s）。那是八十年代末，我正申请美国的博士项目，从未参加过任何托福或 GRE 培训班的我，心里既紧张又期待。结果出炉时[5]，我仍记得那份欣慰：托福成绩六百三十分[6]，GRE 两千多分。在当时的申请环境下，这两个分数都算非常不错。正是凭借这两门考试成绩，我最终顺利进入了美国的博士项目，并获得学校全额奖学金资助。

回望过去，那两次英语考试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虽然前一次我毫不在意、置若罔闻，而后一次我则废寝忘食、心无旁骛。从高考那“七分”的挫败，到托福与 GRE 的亮眼成绩，英语像一条隐秘却强劲的暗流，在不经意间为我打开了另一条道路，把我带到了太平洋的另一边，带到了全新的知识世界，也带到了另一种人生可能性。

而回看这些年走过的路，越走越能体会到外语学习的深刻意义。在这个时代，世界早已不是彼此隔绝的岛屿，而是一块互相连接、命运相牵的大陆。人类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同呼吸、共挑战，无论是科技、文化、学术，还是日常生活，都在一点点走向交织与融合。

语言，在这样的世界里，不再只是沟通的工具，它是一座跨越国界的桥梁，是理解彼此思想的钥匙，是打开新视野、新机遇、新人生的门扉。它让我们听见地球另一端的声音，让我们与陌生的人共享同一组文字、同一种知识、同一段文明的故事。“地球村”可不仅仅是一个口号！

对我而言，英语不仅带来了学术道路的延展，更让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世界原来如此之大，而人类又如此之近。我们只是同一颗星球上的旅人，语言让我们得以在浩瀚的人类共同体中互相找到对方，得以携手探索、交流、合作，让彼此的生命在碰撞中更加丰盈。诚于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于不可言说之物，必须保持沉默[7]”，语言的限制就是我们世界的限制。

因此，如今回望那二十二年的求学生涯，我最感激的不仅是考试成绩或学历的积累，而是那份因语言而打开的世界，那种在“一个地球”概念下真正与世界同频的能力。它使我有机会走出去，也能让世界走进来，让我在时空流转的旅途中，不再只是旁观者，而真正成为地球上无数声音中的一个回响。

语言，是我人生的桥梁；也是我走向世界、理解世界、与世界相连的方式。

---

5 我拿到成绩的过程挺搞笑的。当时我在研究所上班，我妻子去考试中心取的成绩单。因为她在我单位找不到我，就把分数写在纸条上，放在了我的自行车后座上。等我拿到成绩单的时候，快下班了，我们还要参加围棋比赛。我的对手不让我弃权，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下完。当然，心神不宁的我，输了个干净。LOL

6 旧版纸笔考试 (PBT) 分数 (670)：纸笔托福考试 (PBT) 的分数范围为 310 至 677 分。670 分接近该范围的上限。当前网络考试 (iBT) 分数 (0-120)：当前网络考试 (iBT) 的总分范围为 0 至 120 分（四个部分，每个部分 30 分）。2026 年即将实施的分数 (1-6)：自 2026 年 1 月 21 日起，托福 iBT 考试除了 0-120 分制外，还将采用新的、简化的 1-6 分制评分。

7 这句话出自奥地利哲学家路德维希 · 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处女作及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它是全书的最后一句话，即第 7 条命题。德文原文：„Wovon man nicht sprechen kann, darüber muss man schweigen.“ 英文译文：“Where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of one must be silent.”

5 名字响起来

部 I

在北美的岁月中，我有幸参与了三场足以锚定人生的毕业典礼。第一场属于我自己，那是历经寒窗苦读后，为博士生涯划上的终点，闪烁着个人奋斗的孤光；而另外两场，则是属于我孩子们的，它们标志着新生命的启航。这三场盛事，宛如屹立在时光海面上的三座灯塔，跨越数十载寒暑遥相呼应。尽管它们投射出的光影迥异——我那一座是执着与突围，孩子们的那两座则是希望与传承——却共同交织成我生命中最明亮的坐标。

关于我自己的那场毕业典礼，我的记忆已经模糊得像隔着雾窗看风景。那天究竟阳光有多亮？帽穗究竟是左边还是右边？教授们在台上说过什么祝福？我几乎都想不起来了。我只记得为了保存那一刻，我还特意买了整场典礼的录像带。但时光像调皮的孩子，我连录像机如今被塞到哪个尘封角落都忘了，也许永远再也放不出来了。

倒是后来孩子们的典礼，我记得清清楚楚，仿佛每一次鼓点、每一次掌声，都还回荡在耳边。

毕业典礼最具有仪式感的，就是唱名（roll call）。学生们像一条流动的河流缓缓上前，一个个从院长或校长的手中接过象征性的毕业证壳子。真正的文凭一般在数周后寄到你家信箱里，那一刻你拿在手里的，只是一个“未来的空壳”。

但空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会被念名字。是被全场念出来，被世界念出来，被此时此刻的命运念出来。

名字响起时，台下就会沸腾。父母、兄弟姐妹、同学朋友，甚至远道而来的奶奶叔叔，都像临时兼职的拉拉队，把你的名字喊成烟花。一个普通年轻人的名字，第一次在公开空间里拥有了回声。

然而，在这庄严的时刻，唱名环节却往往成了最考验定力的“翻车现场”。国际学校的学生如百川归海，其姓名跨度之广，足以勾勒出一幅全球地图：从广袤的蒙古草原到湿润的印度海岸，从深幽的北欧峡湾到炙热的中东沙漠，可谓琳琅满目，气象万千。那些名字背后的语言逻辑，往往让念名官措手不及：有的名字整串字母中竟觅不到一个元音，读起来仿佛是某种神秘的电码；有的拼音发音则与拉丁语系毫无瓜葛，全凭听者想象。每一次念名，都是一场在舌尖上跨越国界的冒险。

台上的读名老师简直像用生命在拼语言学学历。我粗略估计，至少有 20% 的名字被念错。错得五花八门：有的把男生念成女生；有的把三个音节拼成一个；还有的念到一半，自己先愣住了。

但正因为如此，唱名也成了最容易出现“意外名场面”的环节。

那是 N 年前的纽约某大学毕业典礼。他们的唱名方式非常“人治”：学生在上台前，把写好名字的小纸片递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照着念，念完算数。

这种机制，当然为恶作剧提供了绝佳土壤。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女生。她走到后台时，心血来潮，把歌坛天后——碧昂丝[1]的名字写在了小纸片上。

等轮到她时，唱名老师完全没反应过来，只本能地顺着手里的纸条念了出来：

“*Beyoncé Knowles*!”

那一刻，仿佛整个礼堂的空气都停顿了一秒，然后瞬间爆炸。全场笑声震天，掌声雷动，连主席台上的教授们都忍不住相互看了一眼，笑得险些从椅子上滑下来。

而那个女生，带着完全控制不住的笑意走上舞台。那是她专属的一次“世界级亮相”，比念出她本人的名字，还要难忘千倍。

几年后参加芝加哥地区某大学的典礼时，我发现唱名方式已经被技术接管。

上台前要扫两次码，第一次入队，第二次确认身份。系统会自动把学生的姓名、学院、专业投射到大屏幕上，精准无误。

恶作剧完全没有机会发生了。老师们也终于从陌生名字的深渊里解放出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却隐隐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那种可能随时冒出一朵笑声烟花的不确定性，少了那种混乱中的活力和青春的恶作剧。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唱名始终是毕业典礼的灵魂。因为那一刻，被念出来的不只是一个名字。

当那个名字被郑重念出时，在空气中振动的不仅仅是几个音节，而是这个孩子四年来步履维艰却从未停下的所有努力。那是他在图书馆清冷灯光下熬过的每一个深夜，是那一杯杯驱散困意、强撑清醒的苦咖啡。那短短的瞬间，重叠着他曾经历过的失败、焦虑与挣扎，也镌刻着他咬牙之后的坚持。此时，名字不再只是一个代号，它是他过往全部青春轨迹的凝练，更是他即将奔向广阔世界的出征号角。

在那几秒钟里，一个普通青年短暂地成为全场的主角，天下谁人不识君!

我参加过三场毕业典礼，而我永远最期待的，就是这一刻：看着一个个名字腾空而起，像点亮夜空的火花，照亮一个年轻人的未来。

---

[1] Beyoncé Giselle Knowles-Carter: 美国超级天后，格莱美奖保持纪录人，获奖次数高达 40 座；美国女歌手、词曲作家、音乐制作人、舞者及演员。

6

恋自桃花源

部 I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南方的城市灯火正亮起来。那时的广州，是无数南下打工者，特别是湖南人，梦开始的地方。

一个来自湖南常德的农村女孩，也在那一年背上行囊，离开了桃花源般宁静的家乡。她刚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父母叹口气，也只能劝她出去闯闯。于是，她坐上了开往广州的绿皮火车。火车一摇一晃，从油菜花地驶进了南国的喧嚣。

她在市区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家海鲜餐厅的前台。那是家颇有格调的餐馆，装修雅致，满是港风，窗外能看到闪烁的霓虹。老板是个中年男人，听说是从美国回来的华侨，在广州开了几家店，做事规矩讲究。女孩勤快、笑容甜美，声音柔中带脆，不几天便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服务员。客人多时，她忙得脚不沾地；闲下来的时候，就在柜台后擦杯子，看窗外霓虹闪烁，想着家里的油菜花和稻田。

那年九月的一天下午，餐馆来了个年轻客人。穿得讲究，说话却有些结巴，口音古怪，像是中文学得不太地道。偏偏他态度傲气，点菜的语气里透着命令感。女孩心里一阵火起，冷冷地回了他几句，还没等他反应，就让他“出去冷静冷静”。

这一幕被店里的人看在眼里，气氛顿时有点尴尬。老板听见动静，从后厨出来，一看竟是自家儿子。原来，这个年轻人正是他从美国回来的独子。暑假期间来广州小住，说是想“体验一下父亲的生意”。因为从小在国外长大，他的中文总不流利，性子又有点孤傲。老板知道儿子被顶了一顿，却没有责怪前台女孩，只是摇头一笑，把两人都打发回去。

女孩心里忐忑，以为自己得罪了“太子”，怕明天就丢了工作。可没想到，第二天下午，那位年轻人又出现了。这回他神情认真，手里捏着两张电影票，用有些生涩的中文说道：“昨天……对不起。请你，一起看电影。”

女孩愣了一下。她本想拒绝，却被他笨拙的道歉和真诚的目光打动，心头忽然一软。那天下班后，他们一起去了电影院。放映厅里光影闪动，银幕上映着香港的爱情片，男孩看不大懂字幕，只是时不时转头看她笑。她笑起来的样子干净得像山里的泉水，“春来遍是桃花水”，令他心跳得不由自主。

从那以后，他们常常见面。一起逛夜市、吃糖水、在江边吹风。男孩开始学几句长沙话，她则偷偷在英语书上查单词。语言笨拙，但心意通透。爱情有时就是这样，不问出处，不问逻辑，只要一个回眸便能燃起火光。

然而，好景不长。一个星期后，老板发现了这桩“前台与公子”的恋情。震怒之下，他训斥了儿子，并在第二天就让人订了回美国的机票。临走前，男孩什么都没说，只留下一个小纸条：“等我。”

女孩也因此被辞退。那段时间，她在陌生的城市里独自漂泊。她换了工作，白天笑着迎客，晚上躲在出租屋里掉泪。可她没有忘记那句小纸条上的“等我”。

几个月后，圣诞节临近。广州的街头挂起了彩灯。就在她以为那段情已是过眼云烟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身影又出现了。男孩背着旅行包，一脸风尘。原来，他瞒着家里，趁寒假飞回了中国。

两人再次相见，话不多，只是静静地对视，心里却都明白。男孩说，他已经决定结婚。“桃花源里可耕田，不问人间兴亡事”。家里反对，他就靠自己的方式去争取。

一年后，女孩拿到了签证，登上了飞往美国的航班。那是她第一次坐飞机，窗外的云层翻滚，像家乡的白雾。她紧紧抓着座椅，心里既紧张又激动。彼时的她，还不懂未来有多少挑战在等着。

到了美国，语言成了第一道坎。文化的差异、生活的孤独、家人的冷淡，一时间全涌上心头。公公对她始终不冷不热，婆婆却待她如女儿。男孩耐心、温柔，把她护在身边。慢慢地，她开始学会英语、学会开车，也适应了大洋西边的生活。

后来，他们有了一儿一女。男孩成了硬件工程师，闲暇时仍旧喜欢跳芭蕾，那优雅的姿态让人想起他年轻时的执着。而他们的儿子，也继承了这份天赋，在舞台上轻盈旋转。血脉的延续，是命运最温柔的安排。

多年以后，我见到他们一家四口。男孩已不再是那个傲气的少年，女孩也不再是青涩的湘妹子。她眼神里多了从容与柔光，说话仍带一点点湖南口音，却已带上了世界的气息。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爱情，本就不属于喧嚣的人世，而像从桃花源走出来的一阵风，带着山水的清气与命运的偶然，在时间的流波里，留下一段温柔的回响。

7 命运的岔道

部 I

李杨拿诺贝尔奖后，坊间一直传有些不和，大家网上一搜也能看到。不过说实话，刚刚开放那几年，李正道对中国物理学界的帮助，其实远大于杨振宁。他当年推动的“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 [1]），为一整代中国学者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门。

当然，辉煌的背后也有悲剧。最著名的，就是“卢刚事件”[2]：一个留学生因心理失衡，开枪射杀了导师和同学，震惊中外。

物理界的这个项目带动效应很大，后来生化界也办了一个类似的项目 (CUSBEA [3])。那批学生里也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对中国科学的整体发展影响深远。不过，今天我要说的，却是这个项目间接引发的一场悲剧。

在我出国前某一天，我和哥们 L 在成都一环路边的一个餐馆里道别，不经意间 L 聊到了他另一个朋友出国前故事 [4]。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事。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一点点打开国门，空气里有一种躁动的希望。年轻人读英文报纸、听 BBC/VOA、学托福，街头巷尾都在谈“出国”这两个字。大多数大城市都设有英语角 (English Corner) [5]，方便人们交流学习英语。

在那股潮水里，有个年轻人, 我叫他 A 吧。A 是学化学的，头脑灵活，性子却安静。L 和 A 都是三线子弟，父母从东部城市搬到了四川的山沟。他俩从小一起长大, 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同学，关系很铁。

A 学习特别用功，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八十年代中期，A 考上了 CUSBEA 项目。当时出国的名额可是少之又少，能入选的都是当时全国最顶尖的一批青年才俊。而他，是那幸运的一个。

A 的家人兴奋极了！母亲在街坊间到处传喜讯，父亲特地请了照相馆拍了一张全家福。黑白的底片上，A 穿着一件白衬衣，眼神亮得几乎要透出来。那是一个相信努力就能改变命运的

---

1 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由物理学家李政道和中国物理学界合作创立。当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高等教育还在重建之中。美国招生使用的成绩单、推荐信等手段在中国高校不常见，其可信性很难评估。美国的研究生入学标准考试 TOEFL、GRE 也没有在中国开展。在李政道的游说下，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大学（最终多达 97 所）改用 CUSPEA 选拔中国留学生。1989 年，CUSPEA 项目正式结束，中国申请来美的留学生改用美国高校的常规方法选拔。

2 是指 1991 年 11 月 1 日就读于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中国大陆博士留学生卢刚（1963 年 11 月 8 日-1991 年 11 月 1 日）在校园中射杀数人的枪击事件。该事件在当时曾震惊中美两国，也引起了一场关于中美两国教育弊端的讨论。2007 年，美国电影《盐湖城校园事件》，就是依卢刚校园枪杀事件改编。

3 吴瑞: (英语：Ray Wu，1928 年 8 月 14 日—2008 年 2 月 10 日)，美国生物学家、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DNA 测序、基因工程、生物技术领域的重要开创学者之一。发起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联合招生（CUSBEA，China-US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使中国大陆四百多名学生得以到美国大学攻读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生。

4 **在发表之前，我把此篇发给了 L 审阅。L 说我张冠李戴了：出国前美容的是他的研究生同学，而不是发小，发小依然在美国，其他情节正确。为故事之计，保留原文。**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英语角”几乎成了时代的象征。每到周末的傍晚，大学校园里、公园里，总会聚起一群年轻人，口中结结巴巴地说上几句英语。人们并不在意语法是否正确，发音是否标准，只想抓住每一个表达的机会。英语角不是课堂，却比课堂更热烈；不是舞台，却让无数人第一次感到，世界的大门，正在一点点向他们打开。

年代。

出国手续一切准备妥当。可就在启程前几个月，A 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他想“改一改牙”。他有点轻微的地包天，下颌略凸，说话时下唇总要微微上顶。他自己并不太在意，可听说要去美国读书，心里难免有点不安。他觉得既然要出国，就该把自己的这个小毛病改一下。

那时的整牙、正颌手术在国内还属新鲜事。于是他开始寻找，并找到了一所全国著名的口腔学院。A 托了人，挂上了号。据说那位主刀医生是全国闻名的专家。无论是技术还是声望，都足以让人放心。手术那天是夏末，天气燥热。A 一个人去了，没有让家人陪。他甚至还带着一点轻松的心情，想着手术完了正好赶上体检。可谁也没想到，那竟是他最后一次走进阳光。时也命也，“何事辛苦怨斜晖”。

后来当然家属闹过，院方也彻查过，但没查出明确问题。L 从 A 父母那儿得到的信息是：

主刀医生以前做过数例手术，从未出过差错。偏偏这一次，这个正要出国深造、满怀希望的年轻人，却没能挺过去。手术中原本一切顺利，麻醉、切开、调整骨位，全都照规程来。可是缝合时突发大出血。那是无法预料的，几乎像命运在那一刻冷冷地伸出手。抢救持续了几个小时，医生们拼尽全力，但血始终止不住。A 就那样静静地走了。

A 的故事在我们之间传了很久。那时出国热正盛，很多人听后只是惋惜一声，然后又匆匆奔向签证处、语言班、或者去买打包箱。可在我心里，总觉得那事像一根刺。

也许，如果没有出国的计划，他不会想着去动那个手术；也许，如果不是那样一个年代，他也不会那么急着让自己变得完美；也许命运早就写好了，只是我们当时太年轻，看不出它的笔迹。

几年后再想起他，我总会想：他要是晚几年，也许能活。那种手术，现在早已是例行小事。可那时的技术、设备、药物、麻醉等等全都刚刚起步，一线生机与绝境只隔一层呼吸。

人生的悲剧，往往不在于错误的选择，而在于我们以为自己能掌控的那一点点完美。命运就在那一瞬间松了手，连告别都来不及。

每次想起他，我就想起那句古人之语：“满则招损 (Perfection is a mirage)”。人这一生，总要留一点不完满，才有空间让命运绕过我们。

8

千禧年股灾

部 I

那是 2000 年的春天。硅谷像一座即将沸腾的实验室，空气里弥漫着咖啡、梦想与金钱的味道。

互联网泡沫正处在顶峰，初创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新公司每天成立，也每天有人一夜暴富。几乎每一家餐馆、每一场午餐谈话，都离不开股票、期权和 IPO。仿佛整个湾区都在参与一场盛大的财富游戏，而所有人，都坚信自己不会是最后一个接盘的人。

那时，我在硅谷一家中型科技公司工作。公司虽然不算一线，但也赶上了时代的浪潮。同事们每天午餐讨论的焦点，不再是代码或项目，而是股价的曲线、哪支科技股即将上市、谁的分红足以让他提前退休。我对股市并不熟悉，更多时候只是听他们谈笑，就像一个旁观者，试图理解这场集体狂热背后的逻辑。

我的同事文森特，对投资尤其痴迷。他聪明、乐观、语速极快，总能在咖啡时间滔滔不绝地分析市场走势。那时他几乎每天都在刷新纳斯达克指数，用兴奋的语气告诉我们某家新创公司的股价又翻了几倍。“这是时代的机遇，”他常说，“错过这一波，可能就得再等二十年。”

后来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把房子抵押出去，申请了一笔巨额保证金贷款，打算加杠杆投资科技股。他坚信市场会继续上涨，相信这场盛宴不会马上结束。

我记得那天他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狂热的光。我隐隐觉得那光里藏着危险，却也被那种信念所感染。毕竟，在那样的年代，谨慎几乎成了一种怯懦。我问他是否担心风险，他摆摆手笑道：“放心吧，我做了功课。市场只会向上。”

一周后，泡沫破裂。纳斯达克指数像被抽空的气球，从高空坠落。屏幕上的数字一日比一日低，公司的午餐时间变得寂静无声。新闻标题里全是“蒸发”“崩盘”“裁员”，原本喧嚣的咖啡馆，也多了几分落寞。101 号高速公路沿线的办公楼也失去了灯光。

文森特失去了所有的投资。保证金贷款让损失倍增，他不仅没了积蓄，还背上了巨额债务。“断送一生憔悴，只销几个黄昏。”我记得那天傍晚，他独自坐在停车场的车里，车窗映着昏黄的路灯，他的神情空洞，像被抽干了灵魂。后来他告诉我，他在考虑卖掉房子来偿还贷款。那是他唯一的退路！

我替他感到心痛，却帮不上什么忙。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看着他一点一点收拾残局：卖房、搬家、重新开始。他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眼神中带着疲惫与沉默的人。但他从未放弃工作，也没有离开硅谷。他说：“至少，我还会写代码。”

几年后，他终于还清了债务，重新站稳脚步。可那段经历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只是财务上的创伤，更是信念的破碎。

那场崩盘教会了他，也教会了我们所有人：市场的繁荣如春花般绚烂，却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凋零。在资本的游戏中，乐观是一种美德，但杠杆，往往是悲剧的序曲。

有人为此失去了所有资产；有人失去了家；有人失去了亲情；也有人，失去了生命。

最终，我们都明白了一个残酷的真理：股市终将征服任何一个不相信它力量的人。

多年以后，当我再次经过那片熟悉的街区，那些曾经的初创公司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名字、新的梦想：新的“独角兽”在诞生，也在消亡。

阳光依旧洒在硅谷的街头，工程师们仍端着咖啡走进办公室，讨论着 AI、加密货币、量子计算……。仿佛时间从未教会人类什么，我们依然在希望与贪婪之间徘徊，一次又一次，把信仰交给市场的潮汐。

也许，这正是股市的力量所在：它吞噬，也创造；它惩罚，也诱惑；它让人迷失，却也让人清醒。

“几度东风吹世换，千年往事随潮去”。千禧年的泡沫早已破碎，但那份关于“还要上涨”的幻觉，却在每一次新的热潮中死而复生。

在资本的轮回里，没有人真正无辜。我们只是在各自的时代里，用不同的方式，重复着相同的梦。

9

继续往西飞

部 I

飞机缓缓滑行在旧金山的跑道上，夕阳将天空染成金红色。透过舷窗，可以看见远处的金门大桥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像一根通往故乡的红线，静静牵引着旅人的思绪。

“Hi，旅行还是出差?”邻座的两个中年汉子攀谈起来。飞机尚未起飞，空气里弥漫着咖啡与燃油的气味。几句寒暄之后，话题就自然转向了回国、亲人、和那熟悉又陌生的家。

大家都是回国探亲的旅客。一个在湾区做工程师，一个是刚退休的医生，还有他，一位略显寡言的中年人，只是偶尔笑笑，插上几句。他们谈美国的物价、国内的变化、下一代的中文，还有落地后要吃的第一顿家乡菜。直到话题转向“家人还在不在”，他轻轻叹了一口气，声音有些低：“我这次回去……是看我母亲的。”

随即，他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阀门，缓缓讲起了父母的故事。

他的父亲，出生在二十年代末，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解放前读工程系，聪明而理想，心怀家国。建国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重要科研单位，从事国家重点工程。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理想与责任并重，知识分子稀缺，他的世界充满紧迫与光荣。

不久，组织上为他分配了一个妻子，一位出身梨园世家的年轻女演员。她从小唱戏，嗓音清亮如泉，天生丽质。虽然不识字，却能背下整本剧本，唱腔婉转动人，后来进入北京某文工团，是团里小有名气的旦角。

他们的结合，没有爱情，只有时代的意志。一个理性克制，一个热烈天真；一个讲道理，一个凭性子。起初磕磕绊绊，吵闹不断，但日子久了，争执化成了默契。她懂得他的沉默，他懂得她的倔强。

七一年，林帅事件爆发，政治风云骤变。父亲虽只是科研人员，却因某次饭桌上的言论被牵连。虽然未被重判，却让他深刻意识到：北京，不再是他能安稳生活的地方。

那年冬天，他在组织会上主动提出支援“三线建设”。“你真的要去那么远的地方?”母亲哭着问。他只说了一句：“那里需要人。”

就这样，他们离开了北京，也离开了那个让他理想燃烧的中心。

到了西昌，条件艰苦，山高路远，通信不便。父亲在科研基地工作，常常一连数月不回家。母亲则被调入当地文工团，继续从事演出工作。虽然舞台从首都剧场换成了工区礼堂，观众也从文艺青年变成了穿着蓝工服的建设者，但她依然站在灯光下，唱那些人们爱听的戏。她说：“只要有人在听，我就不算离开舞台。”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的夜晚，基地的广播突然传出低沉的哀乐。整个工区都寂静无声。风卷着沙砾敲打铁窗，像在敲着沉重的鼓。那天夜里，父亲从铁柜里取出一瓶茅台，那是他从北京带来的，一直舍不得喝。他坐在桌旁，一杯接一杯地喝。母亲默默坐在对面，不哭不问，只是偶尔为他添满杯，劝君更尽一杯酒！拚一醉!

他们没有言语，只有风声在窗外呼啸，像是整个时代的叹息。那一夜，不只是一个真神的告

别，还是一代理想主义者的终章，更是深层反思的开始。

此后，他们再也没回过北京。“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父亲在西昌去世，母亲留在那里，继续带着文工团的年轻人排戏、演出，说那是“你爸待过的地方”。孩子们陆续长大、求学、远行。

他此刻坐在旧金山的航班上，正是回国去看望那位八十多岁的母亲。

飞机在云端穿行，舷窗外的霞光一点点褪去，只剩下深蓝与夜的轮廓。

北京到了，飞机在晨雾中降落，舷窗外的地平线被一层淡金色的光晕包裹。他望着窗外的天际，神情平静，像是在回忆，又像是在告别。我们在入境大厅握手道别，他提着那只旧皮箱，背影笔直，慢慢地走向另一登机口。

那是一趟飞往成都的航班。我看着他穿过安检，背影渐行渐远。人群流动的声音里，忽然有种莫名的寂寥涌上心头。他没有回头，只是一步步走向那条更远的路。

也许他早已习惯了这种“继续”：从北京到西昌，从青春到迟暮，从理想的高地到现实的荒原。他的父亲在那片西南的群山里度过了一生，而他，如今又踏上了相同的方向。

我忽然明白，那不是旅途，而是一种延续。一种血脉、记忆与命运交织的延续。飞机在夜色中腾起，他的身影融入光影的尽头。

那一刻，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有些人，从未真正归来。他们一生都在飞行。他继续往西飞，飞向那些被岁月遗忘的地方，飞向他父亲未竟的路。

10

波斯到硅谷

部 I

“我虽流浪他乡，但心仍在故园的玫瑰园里歌唱。”

“*Though I wander far from home, my heart still sings in the rose garden of my beloved land.*”

—— 哈菲兹《酒与玫瑰集》（*Divan-e-Hafez*）[1]

阿米尔（Amir[2]）出生在德黑兰一个中上阶层家庭。那时的德黑兰仍是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城市，街上有欧洲咖啡馆的露天座椅，也有不戴头巾却化着淡妆的年轻女子，海滩上偶尔还会看到比基尼女郎。他的父亲是一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人，经常往返于波斯湾沿岸与欧洲港口之间；母亲则是当地大学的教授，拥有英国名校的博士学位。家中书架上摆满了外文原版书，窗台上常放着英国茶具与玫瑰香水。

阿米尔十几岁时，家境优渥。父母在西班牙南部马拉加购置了度假别墅，夏天常飞往瑞士或法国，冬天则去伦敦探望母亲的旧同事。那是伊朗的“黄金年代”，人们穿着时髦的西装、开进口车、听披头士的歌。阿米尔读的是一所贵族学校，英文流利，憧憬着有一天能去欧美留学。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爆发。那一年，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幸运的是，阿米尔当时正在英国参加暑期英语课程，父母也恰好在西班牙度假。他们逃过了一场命运的劫难！

德黑兰却陷入了混乱。街上燃烧的汽车、墙上的标语、突然失踪的邻居……。一夜之间，旧世界崩塌。阿米尔的亲朋熟识中，有人被捕，有人被处决；也有人通过土耳其或巴基斯坦的地下通道逃亡欧洲。更多的人卖掉家产、用尽积蓄，只为买一张通往未知的机票。那些留下的人，则在希望彷徨恐惧与怀旧交织中度日。

革命后，阿米尔一家决定彻底离开。他们先去了加拿大，定居在多伦多。那时的多伦多冬天漫长，雪深及膝，语言又陌生。母亲辞去学术生涯，成了一名家庭主妇；父亲靠旧日的贸易关系勉强维持家计。家里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至少我们还活着。”

阿米尔在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之后进入当地大学，主修土木工程。他天资聪颖，但在异乡也吃尽苦头。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偶尔还要帮父母应付签证和税务的麻烦。几年后，他终于申请到了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项目，赴旧金山湾区攻读硕士。那时的他已能流利使用法语与英语，波斯语却渐渐生疏。

毕业后，他进入湾区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凭着勤奋与专业，很快晋升为项目经理。在那里，他遇见了未来的妻子，一位同样来自中东的移民工程师。两人因共同的漂泊感而相知，很快结婚并育有一儿一女。

生活稳定下来，但阿米尔心中始终有一块石头未曾落地。父亲在他们迁居北美数年后因心脏病去世；母亲孤身一人，几年后选择返回德黑兰，回到她熟悉的街区，与老朋友重聚。从那以

[1] 哈菲兹（Hafez，14 世纪波斯诗人），以其抒情诗《诗集》（Divan）闻名，诗风融合了爱情、哲思与神秘主义，被后世奉为波斯文学的灵魂。

[2] 我认识阿米尔已经很多年了，我们从业务关系开始，后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阿米尔不时都会回伊朗一次。那并不是轻松的度假，而更像一场例行的朝圣。他短暂停留几日，探望母亲与亲戚，偶尔望着老屋斑驳的墙壁出神。那是他少年时代的记忆，也是他无法回去的世界。“谁怜旅愁荏苒。”

伊朗的房产虽未被没收，但革命后的货币如沙般贬值。那些曾属于上层社会的家族，如今大多被时代吞噬。有人流亡，有人消失，有人沦为街头小贩。人们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言论自由和生活方式。在德黑兰街头，他听说昔日的邻居女儿如今在黑市上出卖身体谋生，而新政权的权贵们却开着进口车、住在豪宅里。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被伊斯兰革命以宗教和社会正义的名义推翻。但讽刺的是，这场革命却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更多的苦难和痛苦。这一切令他愤懑又悲凉。

阿米尔在北美工作多年后，创办了自己的建筑与工程咨询公司。十几年来，他将公司经营得井井有条，终于积累下稳定的财富与声望。他常说，自己的人生像一条被迫改道的河。源自波斯，却在遥远的北美入海。

如今，他已年近退休，孩子们各自在美国立业成家。有时他会坐在办公室窗前，看着旧金山湾的落日发呆。那一片金色的海光，会让他想起德黑兰的夕阳。同样炽热，却隔着半个地球的距离。

每当我和他谈起伊朗，他总是感到悲伤和怀旧。他非常想念他的祖国和朋友。他总是希望有一天，伊朗能够再次成为一个自由繁荣的国家。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不能说服自己接受这种革命的结果和新政权，不仅因为他失去了舒适的生活方式，更因为他的人民在苦难中挣扎，而他深爱的祖国，仍在混乱与悲伤中沉沦。“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

他的人生已在异国他乡落脚，但灵魂仍停留在波斯的黄昏里。真可谓：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装不下灵魂。

PART II

禁与惑之间

人生总有一些界线——别人替你画的，你自己默默守的，或是某个瞬间想跨过去却又心虚退回来的。禁忌让人心跳，诱惑让人犹豫，而真正让人无措的，是两者之间那条若隐若现的缝隙：一步之差，就是规矩；再进一步，就是故事。所有的冲动、克制、暗涌、试探，都在这一条缝隙里发酵，成为我们最不愿公开、却又最真实的那一部分人生。

11

手抄本时代

部 II

那是在 1977 年之前，一个尚未迎来高考曙光的旧时代。那时的我，不过是个懵懂而单薄的少年，在乡间的土路和校园的操场之间重复着乏味的日常，虚度着初中的岁月。

那是一个封闭、单调、寂静到近乎窒息的年代。空气中似乎都漂浮着某种谨慎的味道，而生活的颜色，则被压成了一种无法抗拒的灰。

在那样的时代，书籍是一种被严密控制的奢侈。能出现在我们课桌上的，不过是鲁迅、高玉宝等极少数作品、《金光大道》这一类被批准的“安全读物”。其余关于情感、命运、人性的文学作品，不是被束之高阁，便是被冠上“毒草”的名号，被彻底抹除。

我们的课本也十分简陋，有时甚至是几张油印纸张，用一枚订书钉草草固定。纸质粗糙，字迹模糊，偶尔还能看到印刷机留下的墨点[1]。可那就是我们全部的精神资源——在知识都被压缩的年代里，每一页都显得稀薄而珍贵。

手抄本闯入我的生活，是在一个毫不起眼的傍晚。

那天，放学时，我发现同学悄悄塞进我书包里一本旧练习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几个小字——“保密”。

那几个字像一阵风，吹动了我少年心中不知名的涟漪。在那个年代，“保密”意味着危险，也意味着诱惑。

回到家里，我躲在蚊帐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轻轻打开它。第一页上，用蓝黑色钢笔字写着一个标题：

《梅花党》

那一瞬间，我仿佛被拉进了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

故事以“梅花”为暗号，讲述潜伏、背叛与牺牲的间谍故事。情节紧张、曲折，一页接一页如钩子般牵引着我。在那个语言贫乏、思想被限定的年代，这样的故事无异于一道闪电，把少年心中尚未生长的想象全部点亮。

自那以后，我便悄无声息地加入了手抄本的隐秘潮流。

手抄本从不公开流通，却在黑暗中四处蔓延。它们从邻校传来，从城里的朋友处辗转而至，每一本都带着不同的笔迹、不同的纸张、不同的味道。有的纸张发黄、有的墨迹被汗水浸润成孤岛，但无论它们来自何处，都带着共同的气息——一种禁忌又令人沉迷的气息。

我读过《绣花鞋》、《梅花党》……这些故事在当时几乎近乎奢侈：它们有生死、有谍影；谈恋爱，谈命运，谈人性，谈我们课本里绝不会出现的“复杂”情感。

我们在白天谨慎地把它们夹在课本之中，夜晚却又在家里昏黄的光里一页一页地吞下那些文字，仿佛在偷食生活里唯一的甘甜。

---

[1] 郭沫若的《水调歌头 · 粉碎四人帮》就是在油印本上学的，而且我至今仍然记得其中的一部分！

直到那个名为《少女之心》的手抄本出现。

那是高中前我读过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带着情欲与暗示、带着禁忌气息的故事。

它让我脸红心跳，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文学能揭开人性最隐秘的角落。在那个谈“情”都显得危险的时代，那本书像一阵意外闯入青春的热风，让我在迷惘与羞赧之间，看见了世界另一面的影子。

那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次经历“惑”。而“禁”，则来自对这份阅读本身的恐惧与渴望。

后来我才逐渐明白，那些手抄本在那个年代之所以风靡，并不是因为故事本身多么惊险离奇，而是因为——文化荒芜久了，人就会渴。渴情节，渴思想，渴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如今回望，那些故事其实朴素得很。等到多年以后，我开始读约翰·格里沙姆、西德尼·谢尔顿、丹·布朗等作家的小说，才真正体会到节奏的紧凑、情节的精巧、叙事的魅力——相比之下，当年那些手抄本实在简单得几乎稚嫩。

但正因为处在那样的时代，那些稚嫩的故事才有足以点亮我们心灵的力量。

手抄本就像荒原上倔强绽放的野花，虽然被禁止、被压制，却凭着一股不肯屈服的顽强，在一个被禁锢的时代里守住了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最低限度的尊严。

有人因为传抄而被处分，甚至有人因此坐牢。可消息越是骇人，手抄本就越是热烈地传播[2]。它们像秘密的火种，从城市燎到乡间，从学生的书包里一路传到工人、农民的手中，连接起一个时代被压抑已久的精神暗流。

那种传播的路径，悄无声息，却势不可挡。它们没有正式的出版机构，没有报纸宣传，甚至连作者姓名都无从查起，却凭着一页又一页的手抄，在暗夜里穿行，跨越地域、阶层与身份。

某种意义上，它们就像土豆最初传入旧大陆时那样[3]。不起眼，甚至被警惕、被怀疑、被视为不祥之物，却因为饥荒年代的迫切需要，最终以顽强的生命力深入人心，从宫廷流向平民，从精英的餐桌流向农夫的土窖，悄悄改变了无数人的生活。

据我所知，在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始终生活在一个以手抄本为主的文化传播之中。直到上个世纪，这种状态才真正结束。所谓的四大名著[4]，在最初流传时并非定本印刷物，而是依靠一代代抄写、改编与传抄而存在，其作者身份也往往并不明确[5]，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并不被看重。文本本身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流传过程中被不断增删、调整，与读者、传抄整理者和时代共同生长。

正是由于这种去中心化、分散流传的手抄方式，这些作品反而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在战乱、禁毁与朝代更替中得以保存下来，最终流传至今，使我们今天仍能读到它们。相形之下，那些由官方集中编纂、规模宏大的典籍，如《永乐大典》，虽然气势恢宏，却因过度依赖制度与权力而难以承受历史的风雨，终至荡然无存，只留下零星的传说与残页。

多年以后，每当我回想那段日子，内心深处总会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那段岁月贫

---

2 心理是一种奇特的力量。越是被禁止的东西，人们越是想要。逆反心理会推动人抵抗任何对自由的压迫，而“斯特赖桑效应(Streisand Effect)”则让审查本身成为最有效的宣传。于是，禁品反而被赋予了叛逆与独特的光环，吸引力与销量随之上升，就像那些越封越红的书籍与作品。

3 马铃薯约在明代晚期（17 世纪）通过海上贸易传入中国，《清圣祖实录》记载中显示，它一开始也曾被当成“观赏植物”种植在皇家花园。从宫廷流向平民，是因为其作为一种产量高、耐饥荒的作物，在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人口激增、粮食短缺的社会背景下，被推广种植，成为满足百姓温饱的食物来源。

4 又称四大小说名著，指中国文学史上四部具代表性的章回小说，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与《红楼梦》。此称谓源于明代“四大奇书”之说，原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及《金瓶梅》。

5 我认为目前列出的这些四大小说名著作者中，很可能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作者。

瘠、沉闷，却又真实而灼热[6]。我们就在那些昏暗的夜晚、在那些禁忌的故事里，逐渐摸索世界的广阔，也摸索自己的心灵。

或许正是那段偷读手抄本的日子，在我内心深处种下了文学的最初火苗——一种无声的反抗，一种对自由的渴望，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向往。

多年已逝，那些褪色的练习本早不知散落何方。然而只要闻到旧书的气味，我便会想起那盏昏暗的灯、以及我颤抖却无法停止的翻页声。

它们曾隐藏着我青春的禁忌，也承载着我心底最初的惑。

[6] 七十年代末，我们农场的电影院放映电影《红楼梦》，竟因观众过度拥挤而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近二十人遇难。这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12

第一次触碰

部 II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值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岁月。彼时的校园与宿舍，汇聚了一群才情纵横、心怀炽热理想的青年。没有今日的喧嚣与浮华，却奔涌着一种近乎原始的、单纯而蓬勃的生命力。食堂的饭菜虽寡淡得清苦，却挡不住排队时此起彼伏的欢笑；男生宿舍里那份特有的狼藉，反倒成了那个时代不羁灵魂的生动注脚。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信息传递得悠长而缓慢，却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去深思，去凝望。

我们宿舍在一栋栋新居民楼的中间，位于毗邻农田的新城区。结构简单，两室一厅，四个人住。每个房间都有上下铺。白天行李都放在上铺，晚上若有客人来，就把行李挪到客厅，铺个毯子，人就能睡下。那时候的我们，生活拮据但心怀大，世界虽窄却充满故事。

有一天，同学的一个朋友从外地来我们这儿玩，说是顺路来看看老同学。他一进门，整间宿舍的空气似乎都变了。那时候人穿得都很朴素，蓝布裤是常态。想想不久之前，喇叭裤在街上可以被有关人员剪开，那是个思想还很保守的年代！可他不一样，一身便装，上身穿着马球 (Polo) 衫，下身牛仔裤，带着一点香港味儿。

后来才知道，他在部队里服役，负责外联业务。说白了，就是帮部队跑生意、办事情。那个年代的军队经商，在社会上已经不是秘密。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谁都在摸索挣钱的门路，连部队也不例外。

晚上要睡觉了，他神神秘秘地从包里摸出一本东西，压低声音说：“你们看过这个吗?”我们一看，封面是个艳丽的女郎，杂志名字叫《龙虎豹》[1]。

那是我第一次触碰到如此精致的刊物。那本香港杂志的封面光滑如绸，纸张的厚度与质感，远非我们平日里翻惯了的《人民文学》或《收获》所能比拟。没人说话，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奇妙的气息: 新鲜、好奇、还有点不安。大家不自觉地围拢在宿舍那盏昏黄的白炽灯下，看他一页页徐徐翻开。灯影摇曳间，那些印刷精美、清晰可辨的图片，在那个色彩尚显单调的年代里，仿佛一道破空而来的流光，照亮了我们对外面世界最初的想象。

那本杂志后来留在了我们宿舍，成了一个半公开的“秘密”。同班的同学大都有看过。有人笑，有人假装不在意，但每个人都被那种从未见过的“自由”吸引着。

回想起来，那其实是一种象征: 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在那个刚刚放开思想的年代，《龙虎豹》不仅仅是一本杂志，更像一扇窗，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城市的霓虹、人的欲望、还有那种未经约束的表达。我们这些在体制内学习、循规蹈矩的学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文学、艺术，甚至情色，都可以是表达的一种形式。

多年后，我仍觉得，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有两处: 一在诗词，一在艳情。诗词写的是人心的深情与节制，而艳情文学，则揭示了人性的真与欲。它们看似对立，其实都在描写情，一个是含蓄的流淌，一个是炽热的燃烧。

[1] 香港四大元祖地道成人杂志之一，创刊于 1984 年，以色情图片和大胆文词著称。出版第 974 期后，便再无出版。

我到美国不久，就重新读了《金瓶梅》无删全本。那时才真正明白，这部书比《水浒传》或《西游记》都更深刻。它不讲英雄，也不谈神佛，而是赤裸裸地写人间。那种细腻、复杂、真切，是任何史诗都无法企及的。他们写“淫”是为了戒“淫”，是为了宣扬报应，与其它淫书不一样。很多人把《金瓶梅》当成禁书，可在我看来，它其实是中国文学最成熟的镜子之一。

我前段时间整理书时 (因为我收集下载的电子书分散在不同的电脑和服务器上)，无意间翻出了二十年前下载的一套电子书。那是法国和台湾合版的一整套古典小说合集，几十本[2]。当年因为是扫描的直排版，读起来麻烦，就一直搁着。如今找到了电子化版本，我重新开始读起其中的《姑妄言》[3]。

与《金瓶梅》一样，《姑妄言》在文人圈中名声极高，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极具文学价值的作品，虽然都带有世情、讽刺与艳情的成分，但它们在题材取向、文学风格、思想深度上各有不同，甚至可以说《姑妄言》是继《金瓶梅》之后的一种文人化、理性化的延伸与升华。作者喜欢通过诗文、对话来表达人物情感，语言华丽、典雅，情致更含蓄。因此有一种说法：《金瓶梅》是人间炼狱，《姑妄言》是文人清梦。

读着读着，我忽然想起那本在宿舍里传阅的《龙虎豹》。那个夜晚，昏黄的灯光，年轻的笑声，还有那种既羞涩又大胆的好奇心。

也许，那就是我们的启蒙吧。时代推着我们去看、去想、去破除禁忌。从一本文学杂志，到一本香港刊物，从古典艳情，到现代情色，都是人在寻找理解自己的方式。

如今想来，那本杂志的封面早已模糊，但那份记忆却像老酒一样，越陈越香。它提醒我：文学的边界，从来不是文字，而是人心的勇气。

---

2 《思无邪汇宝》是一套大型明清艳情小说丛书，1994 年至 1997 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台湾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共 39 册，收录中国古典艳情小说 45 种，均为校勘整理后的排印本，是中国古代艳情小说的一次大结集。

3 《姑妄言》是一部古典艳情小说，完成于雍正八年（1730 年）。作者为清朝曹去晶，有近百万字，有二十四回本与六十回本。写作背景是清初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士人心态微妙变化的时期。它在精神气质上更加儒雅，也更具有文人批判性。被誉为“清代第一世情小说”

13

滇池的绿叶

部 II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事了。那时候我除了本职工作，还揽了个无偿外差：给老外当翻译。那几年中国科学院的交流项目多，外宾接连不断地来。所里看我英文能凑合用，就把我推出去“历练”。其实所谓历练，就是跑腿、安排吃住、顺便陪笑。

那次来的，是个丹麦来的年轻人，不到三十岁，个子高高的，头发卷卷，笑的时候露出一排亮牙。他好像刚拿到博士，也可能还在念，我记不清了。总之那时候的洋博士都挺自信，讲话带点腔调，眼神里总像在分析什么。

我们从成都出发，坐火车去昆明。全程硬座一夜，屁股都快坐烂。那年月的火车，车厢里混着泡面味、桔子皮味、油烟味、烟草味，整车人吵吵闹闹，孩子哭、大人抽烟、有人打牌、有人唱。我们靠着行李打盹，一醒来天已经亮了。窗外的山一层叠一层，慢慢变得干净、明亮。年轻的时候，不管多苦都能熬出趣来。

到了昆明，天亮得刺眼。空气里有股淡淡的甜味，阳光硬生生地打在人身上，像被洗了一遍。第二天我们去滇池玩。那时候的滇池还远没现在这么整洁，湖水有点浑，岸边杂草一大片，风一吹就沙沙响。我们沿着湖边走，一路瞎聊，从植物讲到教育、讲到中餐、讲到他在哥本哈根骑自行车的事。

快到傍晚时，爬上一个小山坡。下面的湖闪着一层金光，风从湖面吹上来，带点潮味。老实说，那时候的我有点百无聊赖，年轻气盛，对风景没什么感觉，只想着早点回去吃饭。可那个丹麦小子却兴奋得像考古发现。他忽然蹲下去，在草丛里翻弄几下，摘了几片绿叶，小心翼翼地夹进笔记本里，还压了压。

我看得直纳闷，问：“你干嘛呢？采标本啊？打算把中国草带回欧洲去种啊？”

他这才抬起头来，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让我一愣的话：“Opium poppy.”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他嘴里说的是罂粟。

“你说这玩意儿是罂粟？”

他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Maybe wild one.（可能还是野生的）”

我狐疑地看着那几片叶子，心想这哥们怕不是搞错了草。可他挺认真，回去还拿清水洗干净，晾在窗台上晒。那几天，他每天都去看，像养宠物一样。几天之后应该晒干了，他貌似兴奋地笑着对我说：“It’s gone.（已经消灭干净了）”。

后来我才知道，云贵高原确实存在野生罂粟残留。且清朝时期，林则徐禁的是“洋烟”（鸦片），打击了外国输入的鸦片。而当地种植的“土烟”在当时作为经济和税收来源，长期以来则根深蒂固。由于其极高的经济效益，不仅为农民所喜爱，也成为地方政府缓解财政困难的不二选择。清朝后期，中国甚至成为世界鸦片消费的主要来源国和输出国[1]。

[1] 《19 世纪中国鸦片的生产替代及其影响》– 作者：仲伟民；原文出处：《文史哲》2009 年第 5 期。
《为什么说鸦片，“拯救”了大清帝国？》– 作者：最爱君；原文出处微信公众号：最爱历史。

到 1882 年，中国国产鸦片甚至已经扬帆出海。这个曾经让清政府几乎亡国、让无数家庭家破人亡的毒物，当时不但在中国境内自给自足，甚至开始反向出口海外。这种局面的出现，不仅讽刺得近乎残酷，也让当年的英国殖民者懊恼不已。曾几何时，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印度产鸦片换取白银，一度因此大发横财；然而随着中国各地私种罂粟遍地开花，产量节节攀升，价格不断走低，市场迅速从“依赖进口”变成“完全自足”。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国产鸦片的产量已经远远超过印度洋彼岸的竞争者。英印鸦片因为价格高、运输成本大，再也难以与中国民间自产的廉价鸦片争锋。英国商人眼睁睁看着利润被挤压、市场萎缩，不得不承认，他们亲手打开的那道门，最终也吞噬了自身的利益。

国产鸦片的泛滥，只是意味着毒瘤已深深扎根于土地与民间，像野草一样疯长开来。无数农民放弃粮田，转而种植罂粟；地方官吏为牟利视而不见；百姓沉溺烟毒，破家之事层出不穷。因此，当英国人为失去市场而叫苦不迭时，中国却在更深的黑暗中挣扎。一个民族的危机，并不在于出了多少种鸦片，而在于它竟能繁荣到可以外销。

解放后虽然不许种，但那些种子落在山沟、草丛里，春风一吹，又冒出来。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真不是诗句，是现实。我们不认识罢了，可老外倒是门清。

那次回成都后，我还跟朋友讲起这事，大家笑作一团。有人说那老外胆子大，也有人说他装神弄鬼。

后来去昆明，我站在那儿，想起那天傍晚的阳光，还有那个卷发的丹麦人，蹲在草丛间，一脸认真地夹着那几片绿叶。那一刻的他，像是要把整个中国的秘密带回欧洲似的。

如今每当我徒步看到加州罂粟花[2]盛开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天傍晚。夕阳还是那样的橘红，风从湖面吹来，带着青草与泥土的味道。那片绿叶早就化成了尘土，但那一幕，却像被时间夹进了我的记忆本里。那丹麦小子的笑、那句“Opium poppy”一起，成了青春里最意外的一页。“草木本无意，风起自多情”。只剩那一阵风，偶尔还在记忆里轻轻掠过。

[2] 加州罂粟（California poppy，学名：Eschscholzia californica）是罂粟科花菱草属的一种草本植物，原产于美国西部及墨西哥。它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花，花色鲜艳，通常为橙色或黄色。在植物分类学中，它和毒品罂粟同科不同属，是观赏植物，不是鸦片、吗啡等药物的原料。

14 冷海与热酒

部 II

今天八卦一下美国曾经禁过些什么。禁毒大家都知道，但其实，美国还禁过酒。这个事，我是偶然发现的。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也可能快十年了。那些年我们几乎已经把旧金山湾区周围山上的徒步路线全部用脚测量过，后来开始测量海滩。那天我们沿着海边徒步。

加州 1 号公路沿着太平洋海岸蜿蜒向南，从旧金山一路通往洛杉矶，被誉为全美最壮丽的海滨公路之一。行驶其间，峭壁与海浪近在咫尺，仿佛相互依偎；野花在海风中摇曳生姿，远处的山丘起伏连绵，如同凝固的波涛。

加州的海岸线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磅礴气势：高耸的悬崖直插海面，浪花翻滚拍岸，阳光被海风撕碎，洒落在岩石与水面之间。海水呈现出深沉的蓝色，浪尖泛起雪白的光，撞击岩壁时仿佛带着低低的喘息声。空气中弥漫着咸湿的海腥味，又夹杂着远处松林的清香，清冷而鲜明，让人不由得精神一振。

走着走着，我看到一栋建在悬崖上的老餐馆[1]。外墙是灰白的石头，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创于 1927 年”。风从海上吹过，木牌在吱呀作响，仿佛在诉说百年的故事。

我原本只想进去喝杯水，结果越看越有意思。那餐馆的窗户一半面向海，另一半贴着岩壁，门口的木地板被岁月磨得发亮。餐厅不大，屋顶低低的，灯光昏黄，空气里混着海盐和煎牛排的味道。

老板是个白胡子老头，笑的时候露出几颗金牙。我随口问他：“这地方能撑近一百年，不容易啊。”他笑了笑：“那得感谢禁酒令。”我一愣：“禁酒？那是多老的事了？”

于是他慢慢讲起了那段往事。

一战结束后，美国社会酗酒成风，暴力事件频发。政府于是脑子一热，颁布法律全面禁酒[2]。那一年是 1920 年，禁令一出，全美国的酒厂一夜之间关门。当时只道是寻常的所有酒吧都成了非法场所。可人性难改，这禁令越严，人们越想喝。

那时候，这家餐馆就成了秘密基地。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崖边屋。

它背后有一条小路，从悬崖蜿蜒下去，直通海滩。白天，店里卖的是牛排和海鲜；到了晚上，餐厅的灯一暗，音乐轻轻响起，客人们陆续进门。那时的酒不是当地买来的，是从加拿大走私，用冷洋流拖过来的。

北太平洋的洋流，从阿拉斯加沿岸一路南下，冰冷、稳定、方向分明。那些走私船趁夜顺流而来，把酒桶用绳索系在船尾，沉在水下拖行。远远望去，海面平静如镜，只有偶尔闪过的灯光

---

1 Moss Beach Distillery —莫斯海滩酿酒厂，是一家屡获殊荣的餐厅，坐落在半月湾俯瞰太平洋的悬崖边上，在浪漫的环境中供应新鲜的加州沿海美食，每张餐桌都享有海景。

2 美国在 1920 年至 1933 年期间禁酒，这段时期由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确立，被称为“禁酒令”。这项全国性禁令禁止生产、运输和销售酒精饮料，但 1933 年第二十一修正案废除了这项禁令，结束了禁酒令。尽管全国范围内实施了禁令，但非法酒精生产、地下酒吧和有组织犯罪依然猖獗，最终导致禁酒令被废除。

在暗示：底下藏着液体的火。

船到了这片海域，就卸下几桶，把它们藏在礁石的阴影里。晚上，餐馆的伙计悄悄下到海滩，从冰冷的海水里捞出一桶桶威士忌、朗姆、伏特加等等，然后在厨房后面的小门搬进去。酒冷得刺骨，倒进玻璃杯时还在冒气泡。

那时的夜，格外热闹。屋子不大，却总是挤满了人。爵士乐从留声机里沙哑地响起，笑声此起彼伏。男人们抽着烟，女人们穿着短裙、戴羽毛帽，一边喝酒一边跳舞。玻璃杯碰撞的声音混着海浪声，从木窗缝里飘出去，被风吹向黑暗的海面。真可谓“人生得意须尽欢”，冷海热酒夜未央。

我问老板：“那警察都不知道吗?”他笑了笑，眯起眼睛说：“知道啊，不过，他们也来过。”

我们同时笑出声来。有些法律，注定是用来打破的。

后来禁酒令终于在 1933 年废除，这家餐馆却因为那段“暗夜的历史”留了下来。百年过去，外面的世界翻了几轮，可它依旧守在这片海岸上。到了周末，门口依然排着长队。游客、冲浪客、本地人都喜欢来这儿吃饭。不仅是为了那块顶级的肋眼牛排，也为了坐在窗边，看一场海风里的日落。

每当傍晚降临，西天被夕阳染成橙红色，光洒在海面上，像一层碎金。餐馆里灯火渐亮，钢琴声悠扬，杯盏交错。人们举杯欢笑，而窗外的浪花一层又一层地拍上岩壁，带着百年前一样的冷气。

那一刻我忽然想到：人类从来不是因为“自由”而伟大，而是因为在被禁锢的时代，总有人还敢偷偷地喝一口。

顺便说一句，因为这股洋流来自北方，是冷流，所以加州的海边虽然美得惊人，却几乎不能下海游泳。水太冷。可也许，正因为这份冷，才让那段被风掩埋的热酒岁月，至今仍在这片海岸的记忆里微微发烫。

15

艳书收藏者

部 II

我到美国的时候，社会早就已经很开放了。各种书、录像带随处可见，电视到午夜十二点后也什么都能播。我读过的书里说，早在越战期间，美国就开始了所谓的“性解放”，那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所以我一直以为，美国在这方面一向“开明”。直到几年前，疫情之后，才偶然知道，原来他们也“禁过色”。

那天我遇到鲍勃（Bob）时，秋风里还带着一点薄凉。其实我认识他好多年了，只是每次见面就点头打个招呼，从来没深聊过。那天可能天气太好，我们就随口聊了几句，我顺势问他最近在忙什么。谁知道，这一问就像扳开了某个隐秘的机关。话匣子一开，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

鲍勃七十岁上下，精神矍铄，头发花白但梳得一丝不乱。他说自己打着三份工：白天是电脑工程师，晚上照顾一位老朋友，闲暇时间则是“古典 (Vintage) 色情文学”的收藏家和整理者。我当时差点没反应过来，“古典色情文学”？他笑了笑，补了一句：“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些禁书。”

他所说的“古典”，其实是指 1959 到 1975 这些年间的出版物。在那段时间，美国正值“禁色”年代，地方政府各种法律纠纷，明令禁止出版和贩卖此类书籍。所以，所谓“禁色”，其实是“禁书”。直到七十年代录像带出现，这种文化禁令才慢慢松动[1]。

那时期出版的这些书，大多是地下印刷的。封面大胆，故事荒诞，却也反映出那个社会里被压抑的欲望与虚伪的道德。其中不少作者后来成了知名小说家，插画师也有大名鼎鼎的。他们靠这些“见不得光”的稿子养家买房，赚得比正经作家还多。

我问他：“你怎么卷进这行的?”这下他笑了，眼里有点顽皮的光。“那得回到九十年代了，”他说，“我那时在硅谷，闲得发慌。”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我猜，那时候的他，大概是硅谷里一个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父母那一代赶上了硅谷的黄金时代，赚了不少，他自然也不用太为生计发愁。

后来，有一天他偶然在一次车库甩卖（garage sale）里，买下了几大箱旧书。几百本，封面都画得惊世骇俗，书名更是千奇百怪。他翻了几本，就被迷住了。那种老旧的纸张气味、手绘封面的夸张姿态，还有藏在字缝里的社会暗流，让他觉得自己像发现了一片被遗忘的大陆。

从那以后，他一头扎进去了。先是兴趣，后来成了执念。几十年过去，他已经收集了三千多本绿叶出版公司[2]出版的原版书，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收藏之一。

这些书当年都是地下出版，没有 ISBN、没有版权页，连出版商也常是虚构的。于是他召集

---

1 美国在 1959 年至 1975 年期间并未全面禁止所有成人书籍，相反，审查工作主要在地方层面进行，并提交法院审理。这一时期围绕淫秽内容的激烈法律纠纷最终导致了最高法院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最高法院在此期间的判决改变了淫秽内容的法律定义，最终使得禁书变得更加困难。

2 绿叶出版公司（Greenleaf）成立于 1959 年，在 60 年代出版性爱小说的过程中经历了快速发展和严峻挑战。当时，文化对性表达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解释了他们为了成功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出版此类书籍的权利而进行的多次法律斗争，以及他们通过醒目的封面设计来推销书籍的方式。复古时期的书籍包装拥有醒目的封面设计和充满异域风情的标题，其承诺远超实际内容。它们构成了一个既有趣又具有视觉吸引力的数字档案库。

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他们租了个小展厅，开始做电子化整理，还去采访当年的编辑和印刷工人，挖掘那些书背后的故事。

后来他还参与整理了 Earl Kemp 的旧出版档案[3]，那个当年冒着风险推动这些小说出版的编辑，如今成了他合作的朋友。

有人根据旧日记回忆，有人靠残存的合同追溯，慢慢拼出了出版年代、系列、乃至背后真正的创作者。那份工作，听起来荒诞，却细致得像考古。他的网站 Greenleaf Classics Books[4]，记录了这个出版社自 1959 到 1990 年的出版历史。那是上世纪下半叶美国最著名的“成人文学”出版社，数以千计的书曾在全国发行，却在风气变迁后几乎销声匿迹。鲍勃和他的团队的目标，是把那些被尘封的书籍、作者与画师重新归档。网站上已完整整理出 1959 到 1975 年“复古时期”的作品，正在持续补充后期的资料。

如今，他的网站几乎成了全世界唯一研究那个时代“禁书文化”的资料库。在网页上，你能看到每一本书的封面、印刷厂、发行地，甚至是当年某位插画师留下的签名。一整个被遗忘的时代，就这样从地下重见天日。

那天我们聊到最后，太阳快下山了。他忽然说，等整理完，他打算把这些书全都捐出去。原本想捐给加州大学，我说，不如捐给国会图书馆，那地方更像归宿。他听了，笑了笑：“Maybe.（也许吧。）”

我问他：“这些书现在值多少钱?”他想了想，说他已经卖掉了一些重复的，单本都卖了三百美元。按这价算，他手上三千多本，保守也得值一百万吧。但他说得平淡，好像钱只是顺带。

“这不是钱的事，”他说，“那是一个时代的影子。我只是帮他们留着。”

那一刻我忽然有点感动。想想看，那个曾被社会唾弃的边缘文化，半个世纪后，却靠一个老头子用最虔诚的方式保存了下来。他那一屋子的“艳书”，如今倒更像一面镜子，照见一个时代的荒谬，也照见人类对自由的渴望。鲍勃收藏的并不只是艳书，而是一段被遗忘的文化史。那些旧书里的叛逆、欲望与幽默，是一个时代用最大胆的方式写下的：关于自由、禁忌，还有人心。有时候，一个时代的秘密，不藏在档案馆里，而是藏在那些不敢摆上书架的书里。

回家路上，夕阳正好，街上风有点凉。我忽然觉得，禁的从来不是“色”，也不是“书”，禁的，是人心里的那一点自由。只不过，“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

[3] Earl Kemp's eFanzines — 收录了前出版人 Earl Kemp 的个人档案、出版回忆与禁书史料，是了解美国纸浆文学文化的重要资料库。

[4] Greenleaf Classics Books — Greenleaf Classics (绿叶经典) 是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成人文学”出版社。网站致力于记录其 1959 – 1990 年间的出版历史，目前已完成 1959 – 1975 年的“复古时期”书目整理。

16

合法的大麻

部 II

如果你今天走在旧金山湾区的街头，那些挂着绿色十字标志的大麻药房会自然地闯入视线。它们安静地立在社区街角，不喧哗，也不试图营造任何刻意的神秘感。外观与普通的独立药店相差无几，甚至更为温和内敛。而一旦走近，透过干净明亮的落地窗，你会发现内部的布置更像一家以“生活方式”为主题的陈列馆。

货架上摆满各式各样的大麻制品：有的被做成色彩柔和、近乎艺术品般的手工糖果；有的被调成香氛油般的小瓶精华，井然陈列；还有一些包装前卫时髦，宛如来自平行宇宙的潮流品牌。

空气中偶尔飘来的一缕气味——带着青草般的清甜，却又比烟草温和得多——像是一种轻柔的时代注脚，提醒人们：这片土地正经历一场静悄悄却深刻的社会变迁。

几十年前，在街头公开使用大麻仍属不可想象的场景；而如今，它悄然融入生活，就像电动车、自行车道和素食餐厅一样，成为湾区文化的一部分。

然而，这份从容并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美国的大麻与禁毒史，是一条充满戏剧性、争议性，甚至带着历史疼痛的道路。

19 世纪末的美国，几乎没有所谓“药物监管”。那是一个近乎“药物自由”的时代：阿片、可卡因与各式各样打着“万能药”旗号的专利制剂随处可见。社会对这些药物的危害缺乏认识，甚至婴儿的出牙痛也能被鸦片酊“安抚”。直到滥用问题逐渐暴露，公众才开始意识到这类物质背后潜藏的风险。

然而更深层的政策变化并不完全来自对健康风险的担忧，而是与社会矛盾、经济竞争与种族政治紧密交织。

1875 年旧金山颁布的鸦片烟馆禁令，被视为美国禁毒史的起点。但它真正瞄准的，并不是鸦片本身，而是吸食鸦片的华裔移民[1]。这是一个在禁毒史中经常被忽略的事实：禁毒政策有时首先是社会政策，其次才是健康政策。

此后，类似立法接连出现。1914 年《哈里森麻醉品税法》更进一步，将联邦力量正式引入药物管理领域。医生给成瘾者开维持性处方也可能被判定违法，医疗行为被迅速刑事化。禁毒，从此不再是公共卫生措施，而变成一套以执法与惩罚为主的制度。

20 世纪中后期，这条道路被进一步推向极致：1970 年建立受控物质分级制度；1971 年尼克松政府宣布“毒品战争”；随后缉毒局成立、国家机器全面介入；到里根时期，强制性最低刑期让监禁率急速攀升，对少数族裔社区的冲击尤为严重。

但在高压政策与现实需求之间，裂缝最终出现——而最早松动的，便是大麻。

1996 年，加州通过《同情使用法案》，成为第一个医用大麻合法化的州，这不仅是地方政策的突破，也是美国社会重新理解、重新定义大麻的起点。二十年后，加州迈向娱乐化合法，美国

[1] 美国禁毒史的早期阶段，针对华裔移民种族主义情绪是一个重要驱动因素。在 19 世纪中叶，大量华工被招募到美国修建铁路和从事其他艰苦劳动。他们将吸食鸦片的习俗带到了美国。

已有二十多个州开放娱乐性使用。但即便如此，大麻在联邦层面依然非法。州法与联邦法并行，让大麻政策的整体形态呈现一种持续震荡、不断调整的“灰色地带”。

也正是在这种法律混杂的背景下，一些看似普通、习以为常的行为，一旦越过州界，就会突然变得敏感甚至危险。

我孩子的高中辩论队曾赴东海岸参赛，学生们来自加州，其中一名持有医用大麻许可证。对他而言，携带一些大麻制品，就和带维生素软糖或者过敏药一样自然。抵达后，几位同伴本着加州式的好奇心，想体验一下这些在家乡街头随处可见的“绿色产品”，于是那位学生便顺势分享了些样品。

若这发生在加州，可能没人会多看他们一眼。但他们当时所在的，是一个严格禁止娱乐大麻的州。当地学校与执法机构很快介入调查，本是纯粹的学术行程，却因为一份“加州日常”而蒙上法规的阴影。学生被询问、学校必须报告，比赛行程被迫延误。

那一刻，他们才切身理解了美国大麻政策真正的形态：它不像空气，随处一致；更像一团随地形变化的影子——你跨过哪条线，它就在下一寸土地变成另一种形状。

类似的故事不仅属于孩子们。NBA 球员因跨州携带大麻被捕的新闻也屡见不鲜，即便一些州已合法化，联邦层面仍将跨州运输视为犯罪。2025 年 10 月，独行侠队的布兰登 · 威廉姆斯 (Brandon Williams) 就在达拉斯机场因持有大麻被捕——NBA 已经不再处罚大麻使用，但德州却依旧视其为非法，他面临轻罪指控

这些例子共同构成了一个清晰却矛盾的事实：在美国，大麻是否合法，从来不是关于你“做了什么”，而往往是关于你“站在哪里”。

政策、文化、历史、司法与个人经验，在此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网。人们必须在其中学习——学习如何理解社会的变迁，也学习如何在这些不断变化的边界中重新定位自己。

Part III

远方的风向

离开故乡之后，你才真正明白世界的辽阔：山的走向不同，水的颜色不同，连风吹过脸颊的方式都不一样。脚步越过边界，眼睛开始扫描新的地平线；语言里藏着陌生的节奏，街道两旁站着别人的历史。那些我们在书本里读过的文明、传说、古老伤痕和闪亮成就，忽然都以真实的形状扑面而来。远方并非只是距离的延伸或风景的堆叠，它更像一阵阵迎面而来的风，携带着文化的差异、时代的回声，以及他人截然不同的历史与命运。

17

森林里的温泉

部 III

很多很多年前，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语言、文化、食物，甚至空气里的气味，都是新鲜的。就像刚走进大观园的刘姥姥，眼里处处都是未知与惊喜。

那天，我跟导师手下的几个研究生一起出差。目的地在一个偏远的小镇，被原始森林包围，天空高得几乎要擦到云。同行的一男两女都是在读美国学生，我们共三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提了辆学校的车，一路向山里开去。

车上气氛轻松，他们一边开玩笑，一边讨论研究话题。我听得认真，偶尔也插上几句。虽然口音生涩，但内心有种莫名的兴奋。毕竟，那是我第一次出差。

白天的工作冗长而枯燥，直到傍晚时分，一个女同学忽然提议："听说附近有个天然温泉，开车二十分钟就到，要不要去泡泡?"

我们一听，立刻来了兴趣。

"天然温泉？森林里的那种?"

"对啊，很漂亮，还没人。"

于是，我们四个人笑着收拾行李，驱车前往。

傍晚的阳光洒在蜿蜒的公路上，树影在车窗上跳跃。越往山里走，空气越清新，带着松脂和湿土的味道。终于，车停在一条狭窄小路的尽头。眼前是一片笼罩着薄雾的泉水，热气在夕阳下泛着金光。

"我们到了!"女同学兴奋地喊。

我正准备下车，抬头一看，却愣住了。池子里已有三个人，两女一男，全都赤身裸体。

我并不是惶恐，而是好奇。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国度"。人们不以身体为羞，也不以遮掩为礼。那份自然与坦然，让我觉得自己仿佛闯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还在观察，同行的美国同学早已笑着脱光衣服，跳进泉水。"Come on! It's natural!（快来吧！这很自然！）"他们喊着。

我想了想，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冲动。"既然来了，就体验到底吧。"于是我脱下上衣，扭捏之下却保留了裤衩，慢慢走进泉水。

热流瞬间包裹全身，烫得舒服，仿佛身体都被融化。这实际上是我第一次泡温泉，那种感觉前所未有，既陌生又放松。

泉眼在大池中央，热水顺着岩石流向一旁较小的池子。先来的三位法国游客从大池挪到小池，我们也跟了过去。于是，几个人，光着的他们和半光着的我，围坐在热气氤氲的池边。夜色缓缓降临，林间的风带着凉意，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起初，大家都安静，只听得泉水轻响。后来，话题逐渐展开。法国人讲家乡的葡萄酒，美国同学聊旅行的趣事。笑声与雾气交织在一起，飘荡在林间。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温泉不只是热水，更像一场奇妙的交流，没有国籍，没有身份，没

有隔阂。每个人都在那片雾气中，平等、自由地存在。

时间过得很快，一个多小时后我们起身上岸。夜风凉得透骨，却让人神清气爽。法国人挥手告别，车灯亮起，照亮了林间的薄雾。

回程的车上，没人说话。只有广播里传来轻柔的爵士乐。我靠在车窗，看着倒退的树影，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宁静。

从那以后，每次见到那两位女同学，我都会想起那夜的森林、雾气和笑声。但那并不是尴尬的回忆，而是一种温柔的笑意。后来一次聚会上，她们还笑着调侃我："Hey, you were the only one with shorts!（嘿，你可是那晚唯一穿着裤衩的人！）"

大家都笑，我也笑。那笑声里，有一种默契的暖意[1]，人间有味是清欢啊。

许多年后，我依然记得那一傍晚。那一池温泉，不只是一次奇遇，更像是一场心灵的洗礼。

它让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自由"的含义：不是无拘无束，而是能以平常心面对世界。不是丢掉文化的包袱，而是学会在差异中微笑。

那一傍晚，我没有犹豫，只有好奇。而正是那份好奇，带我跨过了羞涩与隔阂，走进了更宽广的世界。

[1] 那天夜里，我第一次觉得，文化的差异其实也可以很温柔。

18 月下硅谷作家

部 III

在认识斯科特以前，我对“作家”的理解非常中国式，也非常天真。在我的印象里，作家都有组织、有编制、有工资，每个月按点写稿，差不多像“文学系统的公务员”。他们不缺稿费，不愁出版，甚至还有年终总结，只是写的不是 PPT，而是小说。

直到在硅谷遇见斯科特，我才意识到我之前的理解大概和现实差着一个太平洋。

那天早晨，我们在公司，那是一家标普 500 高科技公司的咖啡厅吃早餐。早餐是百吉饼——那种可以把人牙齿崩断但硅谷工程师却吃得很自然的食物。我正在努力把一颗过硬的百吉饼从牙齿中剥离出来，一个同事慢悠悠走过来，拍了拍斯科特的后背，说：

“新科幻小说出版了吗?”

斯科特点点头，又摇摇头：“还没有，大概还要几个月。”

我满脑子问号：写小说？出版？你?

在我的概念里，会写代码和会写小说基本属于两种生物——要么住在 GitHub，要么住在文学青年聚集地，从来没有重叠过。

于是我问：“所以……你是作家?”

他一边给百吉饼抹果酱，一边小声说：“嗯，出了好几本书。”

我一激动，问出了一个非常不严肃的问题：“你有没有用核弹轰过地球?”

他头也不抬：“当然啊，很久以前就炸过了。”

语气平静得好像我问的是“你有没有用微波炉热过牛奶”。

之后我们越聊越多，我才知道他的故事比小说还小说。

年轻时他是海军，跑遍亚洲和欧洲，见过各种各样的港口和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退役后跑到硅谷，也经历过差点“飞黄腾达”的时刻——思科曾经邀请他去做副总裁。

我问：“你为什么没去?”

他耸肩：“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能做更酷的事情。结果去了家创业公司，后来倒闭了。”

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语气轻松得像是在复盘一次失败的露营，而不是一段可能改变人生的机会。

不过他生活得倒也不错，在旧金山湾区有房，在夏威夷还有另一套。上班是公司总监，下班写科幻小说。从生活来看，他像个工程师；从精神世界来看，他像个全职幻想家。

那段时间我们常常一起吃早餐，每次我都能问出一些不太正经的问题：

“你小说里的外星人有没有医保?”“不一定，看星球制度。”“那你写过一个全公司一起失业的故事吗?”“真实世界比我编的更残酷。”

斯科特每次都能像回答正经工作会议一样，毫不迟疑，而且非常认真。这让我对“作家”这件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

原来在英语世界，大多数作家并不是靠写作谋生的。写作更像是他们生命里的副线任务，是

他们在白天被现实碾压之后，在夜晚重新找回呼吸的方式 (Moonlighting)。我曾经亲手从一位 Java 工程师那里买过几本平装书，都是他自己写的科幻小说，虽然十多年来我都没碰过它们。

我后来查了很多例子才意识到——这确实是一种文化。

在创作《哈利 · 波特》系列之前，J · K · 罗琳 (J. K. Rowling) 曾在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担任研究员，并在葡萄牙和苏格兰教过英语。在此期间，她开始创作《哈利 · 波特》，但尚未出版任何小说，同时她也是一位依靠公共救济金生活的单身母亲，住在爱丁堡。

在创作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之前，丹 · 布朗 (Dan Brown) 曾是一名歌曲作家、英语教师，也写过一些不太成功的早期惊悚小说，例如《数字堡垒》(1998)、《天使与魔鬼》(2000) 和《骗局》(2001)。他还曾以笔名与人合著了一本幽默书籍，名为《187 个应该避开的男人》。

小托马斯 · 利奥 · 克兰西 (Thomas Leo Clancy Jr.) 曾担任保险代理人十余年。

在成为作家之前，约翰 · 格里沙姆 (John Grisham) 是一名执业律师，专门从事刑事辩护和人身伤害诉讼，他还曾担任密西西比州众议院的民主党州代表。

西德尼 · 谢尔顿也不例外！在成为畅销小说家之前，西德尼 · 谢尔顿 (Sidney Sheldon) 曾是一位成功的百老汇剧作家、好莱坞编剧 (凭借《单身汉与女学生》荣获奥斯卡奖) 以及电视剧创作人 (作品包括《我梦见珍妮》和《哈特夫妇》)。50 岁之后，他开始转型创作小说，并凭借其浪漫悬疑故事获得了更高的声誉。

这些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写作不是他们的职业，而是他们的命运。

回头看斯科特，他写小说也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养活自己。他写是因为那是他唯一能把世界折叠成自己喜欢的样子的方式。工程师世界太逻辑，现实世界太随便，只有他的小说世界里，规则、宇宙、文明都听他的。

有一次，我们午休时顺路去了公司附近的社区图书馆。那是一栋不起眼的小楼，外墙掉着漆，但门口永远有几只晒太阳的流浪猫，看起来比工程师们更懂得人生。

斯科特带我在馆内绕来绕去，像一个熟门熟路的居民。他停在一排旧得有点黄的书架前，那里堆着一些捐赠的科幻小说，封面风格混乱得像多国部队。他指了指其中几本自己的作品，像是在介绍某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我随手翻起一本他的小说，他瞥了我一眼，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写小说是我最自由的时候。现实世界不够大，我就写一个更大的。”

原来所谓“作家”，不是头衔，也不是职业，而是一种生命的姿势。有时候是挣扎的，有时候是浪漫的，有时候是用故事把生活缝补得更柔软。

而斯科特，就是这种姿势的最好例子：白天从事高科技工作，晚上建宇宙；现实里温和谦逊，小说里炸地球；看似普通，却比大多数人活得更宽。

他像拥有两个世界的通行证：

一个是他活着的世界，在白天阳光下，他是硅谷的一颗螺丝；

一个是他创造的世界，在夜色月光里，他拥有自己的宇宙。

19

硅谷签证小店

部 III

近百万华人居住在旧金山湾区。他们之中，有工程师、科学家、教授、学生、商人、艺术家、医生、护士等等。有些是第一代移民，有些则是 ABC（美国出生的华裔）。

许多人每隔段时间仍需办理中国签证的申请或续签，尤其是在回国探亲时，特别是在十年期签证出台之前。随着中国经济成长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中美之间的商务与旅游往来也随之激增。这自然催生了湾区对签证服务的旺盛需求。

然而，众所周知，中国签证的申请流程既复杂又耗时。申请人必须填写冗长的表格，准备厚厚一叠材料，还要亲自前往位于旧金山市区的中国领事馆递交申请，而领事馆仅在工作日的办公时间开放。对于上班族来说，这无疑是个不小的挑战。领事馆门前的队伍常常一排就是几个小时，等待、审核、再等待。根据签证类型和工作量不同，办理周期可能需要几天，甚至数周。

因此，许多人更愿意花点钱，让签证代办机构替他们跑腿，既省时，也省心。

在湾区 C 市中心，就有这样一家小小的签证服务店。某天，我亲自去那里续签我的中国签证。

店主是一位六十出头的中国人，头发已有些灰白，但精神矍铄。他热情地迎上来，微笑着问我需要什么签证。在我说明想续签旅游签证后，他递给我一份表格，并让我准备护照、旧签证、航班行程单、酒店预订单等文件。

我低头填写表格时，听到他在电脑键盘上噼啪作响。店里只有我一位顾客，我便随口问他在忙什么。他笑了笑，说自己正在更新签证服务系统。那是他亲手编写的软件，用来管理申请与文件。

这让我颇为惊讶。“您自己写的软件?”我问。他点点头，眼神里闪着一丝自豪。于是，他向我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以留学生身份来到美国，在东海岸一所知名大学获得了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进入硅谷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工作，做了许多年。

随着年岁渐长，他觉得公司的工作节奏越来越紧张，压力越来越大，生活也渐渐失去了乐趣。“我想做点不一样的事，”他说，“一种能让我自由支配时间，又能用上我所学的工作。”于是，他想起自己在办理中国签证时的麻烦，心生一计：何不自己开一家签证服务店?

他就在 C 市中心租下了这间小铺，白手起家。凭着计算机背景，他设计出一套签证管理系统，把繁琐的申请流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个系统帮我节省了太多时间，”他说，“也让我能专心和顾客打交道，而不是被文件淹没。”

他说，他真心喜欢这份工作。他喜欢帮助别人，那些初来乍到的移民、求学的学生，或回国探亲的家庭。时间一长，他积累了一批忠实顾客，不少人每年都回来找他。“我现在挺满足的，”他说，“能做喜欢的事，帮到别人，还能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养活这家小店。”

后来，疫情爆发。中美之间的航班骤减，旅行几乎停滞。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听到他的消息。但我总希望，他挺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继续在这条小街上迎接每一位需要帮助的客人。

毕竟，在硅谷，这样的故事并不罕见：一个写代码的人，在看似平凡的岗位上，仍用自己的方式去构建秩序与希望。他们或许不再身处华丽的科技公司，也不再追逐风投与估值，但依然以代码为笔，用理性与耐心去描绘生活的框架。在别人的眼中，他们只是小店老板、普通职员，可在他们心里，仍有那份属于工程师的执着与创造力。他们不再改变世界，却仍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身边的一隅更加有序、温暖。这，就是硅谷最真实的一面：一个既属于创新，也属于人心的地方。

这，也是硅谷故事的一部分。

20 欠税的工程师

部 III

美国人常说：人生只有两件事情无法逃避——死亡与税收。在这句话后面，往往还会半开玩笑、半警告地补一句：千万别惹美国国税局（IRS）。

在美国，国税局就像阴影里的捕手。你可以暂时躲开它，但它记得你的名字、你的收入、你所有留下的数字足迹。只要你欠了税，除非连本带罚全部还清，它就会像一个不肯松手的旧账本，永远在你人生里占据一个角落。

不过，真正让人头疼的，是那些不得已、也解释不清的“棘手情况”。我那位前同事汉克，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那几年，我们在硅谷一家孵化器里的创业公司共事。创业公司的日子你可以想象：办公室里堆着披萨盒，咖啡像血液一样被源源不断地消耗，而每个人都有点睡眠不足、梦想过度。汉克是公司的用户界面工程师。人挺聪明而且幽默，但有个致命弱点：不够自律，且永远粗心大意。

年轻时的汉克，常把报税当成“等一下再处理”的事情。今年拖到明年，明年拖到后年，后来竟然干脆试图“装作没这回事”。他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苦笑：

“我当时真傻，以为国税局可能忙不过来不会查到我。”

但麻烦就是这么来的。国税局发现了他的漏税，并且很“温柔”地寄来一整沓罚款单与利息计算表！每一页都像是对他不自律的一次提醒。

汉克当时有钱把税补上，但根本付不起堆成小山的罚金与利息。于是国税局做了他们最擅长的事：

冻结了他的部分工资。

为了避免每个月工资到账就被国税局半截截走，他不得已从全职员工变成了独立顾问（Consultant）。对国税局来说顾问就是“非固定收入”，要冻结工资就没那么容易；对汉克来说，这意味着社会体系中几乎所有需要信用评分的人口都关上了。

他突然成了一个“无信用人”：

- 不能申请信用卡；
- 不能贷款；
- 不能买房；
- 很多公寓连租都租不到！

那时他常自嘲：“我就像在现代社会里穿越回以物易物的时代。”

他去哪儿都得带着厚厚一叠现金，连交网费都要提前跑去门店，用现金缴费。创业公司的大伙都知道他的情况，偶尔会看到他在办公桌前数钞票，数的时候还会被键盘风扇吹得满桌乱飞。

“这都是国税局教我变勤快的。”他拍着那叠现金一边抱怨，一边又忍不住苦笑。

幸好，他的妻子信用良好，对他也极有耐心，虽然当时还是女朋友。租房、办水电、申请网络，全靠她来。汉克常说：“如果不是她，我可能已经得去住房车了。”

人的命运，有时不是被灾难改变的，而是被一张小小的罚单改变的；不是因为恶意，而是因为年轻时那个随手塞进抽屉、再也没打开的信封。

汉克的故事常让我想到一句被说了无数遍的老话：逃不了死亡，逃不了税收。而逃不了税收这件事，有时比死亡更现实、更琐碎，也更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大家一开始只觉得好笑，觉得他像电影里的角色，被国税局追得满地乱窜；可时间久了，我们慢慢意识到这并不好笑。那是一种没有硝烟、却无处可逃的长期折磨。

美国的税务机关有一个令人恐惧的特质：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你。国税局或加州的税委会(FTB)，都是记仇的机构。你欠他们的钱，不管是一百块还是一万块，他们会抱着账本等你几十年。你可以搬家、可以换工作、可以离婚再婚、甚至换一个国家暂避风头……但只要你还在美国境内，他们迟早会找到你。

和其他债主不同，国税局不需要凶神恶煞，也不需要砸你家门。他们只需要轻轻一按键盘，就能：

- 冻结你的工资
- 扣你的退税
- 拿走你的银行账户
- 阻止你申请信用
- 甚至在你卖房时从成交款里直接抽走欠款

他们从不着急，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永远站在他们那一边。

所以每当我想到汉克——他用现金付咖啡、租房都得靠他妻子、连办张手机合约都被拒——我都会暗暗提醒自己：人可以不成功，但绝不能不按时报税。

税务制度或许苛刻，但它至少给了我们一个清晰的教训：

在美国，你可以跟很多人讲道理，唯独不能和国税局讲道理。你只能按时、如实、老老实实地报税。

这并不是屈服，而是一种生活智慧。一种避免让自己的人生变成“欠税的汉克”续集的智慧。

21

湾区彩虹故事

部 III

在 IT 行业，同性恋从来不是稀罕事。倒不如说，它是一种自然存在——像空气、咖啡、代码，或会议上永远讲不完的产品路线图（roadmap）一样自然。

尤其是在湾区，这个以“进步价值观试验场”闻名的地方。性取向从来不是问题，甚至不算话题。科技公司几乎把“包容性”直接刻在企业文化大门上：招聘启事强调多元化，茶水间墙上贴着彩虹活动海报，Slack 里有各种 LGBTQ 群组，连人力资源部的常见问题里都会出现“如何更友好地跟同性伴侣相处”的条目。

一些科技行业的管理人员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他们成为同性恋者权益和可见度的倡导者和榜样。例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并且一直倡导同性恋者的权益。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比如特斯拉和 SpaceX 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对同性恋的态度总体上对成年人持宽容态度，但他的公开言行，尤其是关于他的跨性别子女的言论，常常被 LGBTQ+群体视为敌对行为。马斯克对跨性别女儿的态度，最终导致父女关系彻底疏远。

有人开玩笑说：“在湾区当同性恋，比在美国其他地方当程序员还容易。”我觉得，这句话大概只有一半夸张。

旧金山被称作“同性恋之都”不是偶然。这里是美国最早推动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之一，也是无数 LGBT 运动的发源地。卡斯楚街的彩虹旗全年都在风里猎猎作响，像城市的脉搏一样。而在克林顿时代，还只是“不问不说”；后来，就真的开放了。

在湾区那几年，我换过几家公司，从濒临倒闭的小创业公司到财力雄厚的标普 500 企业。无论团队的规模或文化如何，我总能遇见几位同性恋同事。他们通常友善、幽默、有才华，也更善于在文化、艺术和社会议题上展开深聊。

久而久之，我培养了一种“第六感”。不是揣测，也不是猎奇，而是在长期观察中形成的一种直觉：举止的轻松、兴趣的侧向、语言里的一点细腻。相处三五天后，我大概能隐约察觉一个人的性倾向。

当然，在对方明确告知之前，我绝不会把这些猜测当成结论。性向是人家的故事，不是我可随便翻阅的章节。

也因此，他们偶尔会给我带来一点意料之外的小惊喜。

我曾在硅谷一家游戏创业公司待过。那是个小团队，几位设计师风格迥异，各自带着些艺术家的随性与灵光。其中一位女设计师尤其特别。

她构思界面如同裁云织诗，总能将那些纷繁芜杂、混沌无序的产品需求，重塑为指尖下优雅流畅的韵律。她性格明亮而温润，与她坐下来斟酌色彩的呼吸、构图的骨架或是字体的比例，时光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滑落。

有一天，她走到我桌前，说想请一天假。

我连头都没抬就说：“没问题，你直接在系统里填吧。”

她沉默了半秒，然后补充道：“我妻子的父母从外地来，我想开车带他们四处看看。”

我愣了一下。不是震惊，只是那种“啊?”的轻微卡顿。

大概像是原本以为是白开水，结果喝到一口柠檬味汽水的那种意外。

她看我愣住，似乎反而紧张了：“呃……可以吗?”

我立刻笑了：“当然可以！家庭最重要。”

她松了口气，也跟着笑了。那笑容里有点松动、有点信任，像是终于说出了某句心里话。

就在那一瞬间，我意识到：在这个行业、在这座城市，人们虽然不见得毫无恐惧，但至少知道——这里的空气里，有被理解和接纳的可能。

她愿意告诉我，不是因为必须，而是因为觉得安全。

而那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湾区所谓“多元与包容”的质地——不是政策、不是口号，是一个人敢于自然地说出“我妻子”三个字的平静。

在科技行业，你会慢慢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

人本不该为了做自己而需要勇气。

这本应像呼吸一样自然。但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这种“自然”竟成了一种昂贵的奢侈品。你需要对抗审视的目光，需要冲破隐形的枷锁，甚至需要披挂上阵，才能守住那一丁点自我的真实。

幸运的是，在湾区，这种奢侈显得稀松平常。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这里总能让不同的人找到属于自己的轨道。也为什么，即使离开多年，我仍然记得那句轻描淡写的话——

“我妻子的父母要来。”

因为那不是一句请假理由，那是一种被允许的人生，也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22

乌干达的爱憎

部 III

几年前，我跟随一小群美国校友踏上了前往非洲的旅程。那群人都是我毕业的那所美国大学的校友，年纪不同、背景各异，却都带着一种久未出发的兴奋。

这是一次像久旱之后迎来的甘霖般的旅行；也是一次平替原本计划多年前就已开始的非洲旅行，但由于疫情而被推迟。

从首都坎帕拉（Kampala）一路向西，穿过广阔的平原、起伏的丘陵和被阳光打磨得明亮的湖泊。我们这次丰富多彩的野生动物观赏之旅，尤其以灵长类动物追踪为主，例如在布温迪（Bwindi Impenetrable National Park）禁猎区和基巴莱 (Kibale National Park) 森林等公园追踪大猩猩和黑猩猩；在伊丽莎白女王国家公园（Queen Elizabeth National Park）进行驱车游猎和乘船游览，这些公园以狮子、大象和水牛等野生动物而闻名。

在那里，我闯入了那些教科书永远无法复刻的生命剧场。暮色四合，羚羊群如流动的剪影，在广袤草原上缓缓移过；水牛立于浓密的树影下，用一种深邃而原始的目光与我们静静对望。河马蜷缩在草泽边的水洼里，远看竟像几块被时光打磨圆润的青石；鳄鱼摆动着身躯，在船舷旁掠过一道冰冷的弧线。而象群正成群结队地在泥水中恣意打滚，那一刻，万物安详，世界呈现出一种未经雕琢的、最古老的宁静。

黎明破晓时分，越野车的引擎声在伊丽莎白国家公园的草场上止息，我们与六只狮子并肩而立。当那位狮子母亲投来警觉的一瞥时，那金色的瞳孔仿佛洞穿了岁月的荒凉，透着原始的威严。这样的场景让言语瞬间失去了分量，唯有屏息沉默。在这里，荒野的脉动是如此清晰，大自然近得触手可及，正以一种呼吸般的节奏，吞吐着生机与肃杀。

出发前，我们收到了一份旅行须知。除了签证、免疫接种、现金等常规旅行问题外，其中最显眼的三条是：

- 不谈政治
- 不谈宗教
- 不谈性向

导游说，这些话题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误会。于是，尽管一路上与当地人擦肩而过，我们却总带着一点点克制——像隔着薄纱看一场热闹的舞会。

然而，即便如此，那些被禁止触碰的敏感线外，还有许多细微的情绪、真实的想法，在偶然的时刻轻轻浮现。

最让我意外的，是乌干达人对中美俩国的态度。

我遇到的许多人对中国抱有近乎热烈的好感。他们谈到中国修的路、建的学校、医院，一边笑一边比划着，仿佛那些建设就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生了根。街道上随处可见中文招牌和中国企业的卡车。机场的墙面也贴着合作项目的宣传。这些细节让中国在乌干达显得不像一个遥远的大国，更像一个来过、留下痕迹的邻居。在乌干达，“中国”意味着建设与朋友。

导游告诉我们：“乌干达人把中国当成伙伴。”

有一天，当我们正在布温迪游览时，两名保安[1]之一问我来自哪里。而当他得知我来自中国时，那份友好迅速转为热情。“你要不要考虑投资?”保安越说越兴奋，仿佛我背着一个随时能签合同的公文包。“农业、采矿、制造业，都有机会。”“政府非常欢迎中国投资者。”“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见官员、企业家，马上安排。”

他越讲越认真，而我越听越心虚。我只好不断微笑、点头，心里默念：“我真不是投资人啊。”

但他的热情并不咄咄逼人，更像是一种相信未来的诚恳。在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有时“机会”二字不仅对投资者重要，对他们自己，也是希望的入口。

乌干达人对中国的印象很直接：“看得见的改变，就是好。””他们可能对投资感兴趣。”

但他们对美国的感情却像一团复杂的线，混合了不同的东西：吸引、遥远、又令人怨恨。

在伊丽莎白国家公园那天，我遇到一群老师，他们带着学生来参观。当他们得知我来自美国时，立刻围住了我。

“你们美国为什么不给我们签证?”“我们只是要去参加教师培训!”“为什么非洲人拿美国签证这么难?”

他们的语气里带着委屈、挫败，也带着一种压抑已久的愤怒。我几乎插不上话，他们谈论的内容也完全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关心过这些。。那些堆积的情绪像溢出的河流，一旦开始就关不住。

最终，是导游把我轻轻拉走，把我从那群老师的情绪里救出来。

后来和他聊天，他叹着气说：“我这辈子恐怕也去不了美国。但我希望我儿子能去看看。”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望向远方，像望着一个始终飘在雾里的国度。

乌干达是英联邦国家，官方语言是英语。我原以为他们会更亲近美国。

但真实情况完全相反：对中国：信任、期待、现实的感激。对美国：向往、失望、复杂的怨气。这种情绪的混合，在乌干达显得特别鲜明。他们羡慕美国，却被美国拒之门外。他们尊重中国，因为中国留下了看得见的痕迹。

因此，他们可能认为所有来这里的中国人都是怀有投资目的的商人，而所有来这里美国人都应该能够与他们的国会议员对话，表达他们的关切。

旅行中的风景是辽阔的，动物是自由的，而人心的风向，却显得微妙得多。现在想来，乌干达给我的，不只是草原的风和象群的背影，也不只是狮子母亲抬头那一瞬间的震动。更是一幅真实、复杂、充满矛盾的情感地图。

在这里，人们对中国的友善和对美国的怨言，就像热带稀树草原上的风[2]——有方向，也有力量。

而我，只是恰好站在这风里的一位旅人，并且具有双重身份!

---

1 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周围都有拿着 AK-47 步枪的保安，有时是一个，有时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2 有趣的是，我在那里的时候，耳边一直回响着麦当娜的《La Isla Bonita（美丽的岛屿）》的旋律和歌词：热带岛屿微风轻拂，大自然奔放自由，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美丽的岛屿。

23

蠢乃道德缺陷

部 III

近些年来，简体中文世界里流传着一句半是调侃、半是无奈的话：最容易让朋友反目成仇、让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有三件事——中西医之争、俄乌战争，以及疫情起源。

这话乍听像玩笑，但只要亲身卷入过类似讨论，就会发现它其实一点也不好笑。许多时候，一次原本轻松的聊天，甚至只是饭桌上的随口一问，都会让多年积累的友情在几分钟内骤然降温，甚至无可挽回。

它们形式上完全可以类比为美国社会中围绕“是否禁枪”的长期争论：双方都能列举详尽的数据、极端的个案与强烈的道德诉求，却几乎不可能真正说服对方。因为问题早已不是某项政策是否有效，而是各自对自由、安全与秩序的根本理解在彼此碰撞。

同样，科技界关于“哪一种 Linux 发行版更好”的争论，看似理性、专业、技术细节满满，实则往往夹杂着个人使用经历、圈层归属感与情绪偏好。到最后，讨论不再是系统优劣，而是“你是不是自己人”。

正因为如此，这些话题之所以危险，不在于它们复杂，不在于事实本身是否成立，而在于它们触碰的从来不是单纯的观点差异，而是人们内心深处的身份认同、价值立场与道德感。一旦这些被激活站队完成，理性讨论往往就让位于情绪防卫，而“谁更蠢、谁更坏”，便悄然取代了“谁更接近事实”。讨论便不再是求证，而是防御与反击。“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这正是争论双方的共同心态。

坦白说，我自己也曾是那些争论中的一员，甚至有过一两次差点因此失去朋友的经历。回头再看，我才意识到：我们争的往往不只是事实，而是我们是谁、我们愿意相信什么、我们选择站在哪一边。

如今我已不打算在这些问题上选择立场，也无意说服任何人改变意见。与其重复那些对立，不如趁这些公共争议激起的波澜，提出一些更深、更不容易被情绪遮蔽的问题：

为什么在某些情境下，聪明的人也会说出或做出几乎荒诞的决定？为什么理性在公共讨论中如此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我们为什么如此容易被群体情绪的浪潮推着走，而忘了自己原本的判断？

这些问题，让我想起德国思想家迪特里希 · 朋霍费尔[1] 在八十多年前提出的一个洞见。他在纳粹统治下提出了这样一句极具刺痛感的话[2]：

“愚蠢是一种道德问题，而不是智商问题。”

---

1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 年 2 月 4 日—1945 年 4 月 9 日，德国信义宗牧师、神学家，认信教会成员之一，出生在德意志帝国布雷斯劳（今波兰弗罗茨瓦夫）。潘霍华曾经参加在德国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运动。因同伴计划刺杀希特勒失败，潘霍华在 1943 年 3 月被捕，并于希特勒自杀前 21 天被绞刑处决。

2 英文表达是：”Stupidity is a moral issue, not an IQ issue.” 他德语原文：”Dummheit ist ein gefährlicherer Feind des Guten als Bosheit.”

确实是“初闻满座惊”啊！这句话乍听严厉，但朋霍费尔并不是在嘲笑某些人“天资不足”。他在描述的是一种普遍而危险的社会机制：人可以在不破坏智力的前提下，主动放弃思考。

在监狱中等待行刑的那段时间里，朋霍费尔一直在观察：为何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原本坚持理性的德国公民会变得“愚蠢”？为何他们不再质疑荒谬的宣传，不再怀疑权威的谎言，也不再为明显的不公愤怒？

他最终意识到，问题不在于他们“不会思考”，而在于他们选择不思考。

当一个人把判断力交付给集体、权威或某种政治身份，当他更在乎归属感而不是真相时，他就进入了一种朋霍费尔所谓的“道德愚蠢”状态。这一状态极具迷惑性：个体往往自信、自鸣得意，却对理性完全“免疫”。他们对事实不感兴趣，因为事实会威胁他们的身份认同；他们可能执行邪恶，却坚信自己站在正义一边。

前去后来的思想家进一步扩展了这一理论。康德[3]很早就称其为“判断力缺陷”，指的是明明拥有理性，却故意不用。而现代组织理论家阿尔维松与斯派塞提出的“功能性愚蠢”，更点名了许多机构的潜规则：不去想、不去问、不去反省，反而会让系统运转得更顺畅。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主动缩小自己的认知视野，把自己变成一个高效却无反思能力的零件。

这一切听起来有些黑色幽默，可现实往往比理论更深刻、更刺痛人心。

纳粹时期的德国，便是朋霍费尔观察的活生生实验室。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中甚至包括哲学家海德格尔——选择顺从、沉默，甚至公开支持政权。他们不是智商不够，而是让“服从”替代了“独立思考”，让“群体安全感”压倒了“个人道德责任”。

而当我们转向当代，会发现类似现象并未减少，只是换了新的外衣。

当成千上万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加入一场“情绪狂欢”，不论是谩骂、站队、嘲讽，还是转发未经求证的信息，他们常常在情绪洪流中丢掉自己的判断；当公司里的人明知某些决策有害，却为了升职、为了和谐、或者“不要自找麻烦”而选择沉默；当有人把政治人物视作信仰对象，对事实置若罔闻，因为承认错误会动摇他们的身份；当阴谋论、疫情谣言在社交媒体中迅速蔓延，人们不是“笨”到无法识别谎言，而是他们愿意相信谎言带来的归属感、安全感与简单解释，从而进入“傻子共振”。

在这些案例中，“愚蠢”从来不是智力的失败，而是道德与思考的懈怠。

当我们放弃质疑、放弃独立判断、放弃承担思考的责任时，我们就会被卷入对立、被团体绑架、甚至成为某种力量的无意识工具——无论这种力量是政治、情绪，还是算法。

孟子说过：“山上狭窄的小路，如果专心致志地行走，就会变成大路，如果一段时间不去行走，就会被茅草覆盖遮蔽。如今茅草覆盖住了你的心。”[4]放弃思考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所以，与其一遍遍问别人“你怎么会这样想?”，不如回过头来问自己更根本的问题：

在公共讨论中，我们是否真正保持独立思考？我们是否把判断力交给了集体、情绪、权威或回音室？我们是否曾因害怕孤立、害怕麻烦，而选择沉默或附和？我们是否愿意承受一个真正独立的人必须承担的代价——不被理解、不被认同，甚至被误解？

如果说这个时代真正的危机是什么，恐怕不是观点的对立，而是越来越多人不再愿意思考。

---

3 Immanuel Kant: 1724 年 4 月 22 日—1804 年 2 月 12 日，启蒙时代德意志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其学说深深影响近代西方哲学，并开启了德国唯心主义和康德义务主义等诸多流派。

4 “山径之蹊闲，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闲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孟子卷第十四尽心章句下

朋霍费尔的话提醒我们：思考本身，就是一种道德责任。

24

沙漠中的火人

部 III

想象这样一幅场景：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企业家、工程师、艺术家、诗人、程序员、游牧者——纷纷飞抵加州或内华达州，然后开着形形色色的汽车、卡车和房车，拖着满载物资的拖车，涌进一片乍看荒芜的沙漠。然后，他们在炙热与风暴中搭建起一座以放射状街道命名的临时城市；在这里生活、创作、狂欢、沉思九天；最后，在夜色与火光的洗礼里，让一切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再在黎明前悄然离去——像从未存在过一样，不留一丝痕迹。

他们是不是都疯了？

或许吧。但这正是每年九月初，黑石沙漠所上演的现实。

火人节（Burning Man）并不是一个音乐节，也不是一场嘉年华。它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实验，一座诞生于共同意志的短暂乌托邦城邦。人们称它黑石城（Black Rock City）。它没有市长，没有警察，没有广告牌，没有赞助商，却拥有比许多真实城市更牢固的精神纽带：激进参与、无私馈赠、去商品化、集体体验、无限表达。

在这里，观众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是贡献者、施作者、创作者，也是城市本身的一部分。城市的规则简单而苛刻：你必须自给自足——带上所有你需要的水、食物、住所；你必须参与——不给别人添麻烦，也尽量给别人带来快乐；你必须离开得像你从未出现——哪怕地上多一颗掉落的亮片，都被视为对土地的冒犯。

也正因为如此，它对硅谷有一种近乎磁性的吸引力。那些在高效与压力之中被压得透不过气的年轻工程师，那些被股票价格、发布会节奏、融资周期困住的创业者，那些生活在高度结构化逻辑里的头脑，都把火人节视作一种必要的“精神排毒”。那里让他们觉得自己重新拥有了身体、情绪和创造力；让科技世界的加速引擎暂时停转，让他们回到更原初的样子。传说硅谷的大多数大亨都曾到过那里，一些豪华的设施也是由他们赞助的。

火人节发源于硅谷，最初并非在沙漠之中举办，而是在旧金山的海滩。但随着参与者人数上涨、法规愈加严格，它被迫迁往更加宽广、更能容纳自由的黑石沙漠[1]。而也正是这片荒凉的县境沙地，使它逐渐具备了一种神话色彩。

与普通艺术节相比，火人节的差异几乎是结构性的。普通艺术节讲究观看，而火人节讲究参与；普通艺术节围绕消费，而火人节围绕赠与；普通艺术节结束后留下的是满地垃圾，而火人节留下的只有脚印——而且这些脚印还会被风吹散。

它的艺术形式亦不同。黑石城中最引人瞩目的并非音乐舞台，而是遍地散落的巨大装置艺术：可以攀爬的钢铁迷宫、会喷火的章鱼车、移动的鲸鱼灯塔、在夜色中发光的巨大木制人像……这些艺术品往往由世界各地的团队合作完成，巨大的劳动量、巨额的资金投入，只为了九天，而后焚烧。艺术在这里既是一种献祭，也是一种集体情绪的释放。

[1] 黑石沙漠 (Black Rock Desert) 是一个半干旱地区（位于大盆地灌木草原生态区），由熔岩地和干涸的湖床或碱性平原组成，位于黑石沙漠-高石峡谷移民步道国家保护区内，这是一片淤泥质干涸湖床，位于内华达州里诺市以北 100 英里（160 公里）处，于硅谷东北方向约 300 英里（500 公里）处。

我曾经共事的一位同事艾莎，就是火人节的忠实参与者。我们在一家创业公司共事，每到七月，她都会像召集远征队伍一样，开始招募同伴、分配物资，把路上的食物、水、帐篷、发电设备、装饰品甚至艺术项目提前安排好。她曾邀请我同行。我告诉她，如果我年轻二十岁，一定年年跟着去。每当她从沙漠归来，总会兴奋地向我们讲述那些超现实般的经历：午夜的沙尘暴、陌生人递来的柠檬水、偶遇的雕塑家、星空下的狂欢、清晨的静默冥想。酒精、大麻与自由的灵魂混合在一起，组成了一座科技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提供的精神嘉年华。

当然，火人节并非总是充满浪漫。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足以让所有车辆深陷泥潭，整座城市被迫静止；风暴能把营地的遮阳棚扯成碎布；高温能烤干你身上所有水分。它是一场对于人类创造力与适应力的试炼。

若你想感受火人节所遗留的永久性艺术作品，却不愿忍受沙漠的残酷，不妨去硅谷山景城（Mountain View）谷歌园区散步。那里陈列着几件来自火人节的艺术装置，它们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流落出来的文物，让人怀念那座只存在九天的城市。

火人节的意义，或许就在于它提醒我们：城市不只是建筑和道路，而是一群人关于世界可能性的共同想象。在黑石城，人们短暂地创造并体验了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个不依赖金钱、不依赖权威、不依赖既定结构的社会。这种社会不可能长久，却比长久更珍贵。因为它让人们相信，另一种生活是可能的。

这也正是为什么，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地走进沙漠，把自己交给九天的炽热与自由——然后，在焚烧的火焰中，将自己的某一部分重新点亮。

25

无家可归危机

部 III

如果你在旧金山的市场街散步，或在洛杉矶好莱坞大道的拐角等待红灯，很难不注意到那些色彩斑斓、随风轻颤的帐篷。它们往往整齐又凌乱地排在一起，像是一串被遗落在城市光亮背后的暗影群岛。有时是一条长街的连续排列，有时是某个街角突然出现的三四顶——在游客眼里，这些画面新奇而突兀；在本地人眼里，则是一种沉重到无法忽视的生活现实。第一次经过的人及到美国旅游的人来总会困惑：这些帐篷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在这里？但答案往往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柔和——这里是加州无家可归者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是这个州长期社会危机最直观、最无法回避的外显。

中国人对美国的无家可归问题有了更多了解源于复旦大学毕业生孙先生事件曝光后。2024 年 1 月，一位华人博主在纽约街头拍摄到一个流浪汉并上传视频后，孙先生的身份被复旦大学美国校友会确认。孙先生 1990 年代初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1988 年通过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计划 (CUSPEA) 后赴美深造并取得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他继续做了几年博士后研究，随后转行成为一名华尔街的程序员，曾拥有可观的收入（据报道月薪曾达 10 万美元）。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因婚姻破裂遭受精神打击。2007 年左右遇到金融危机失业后，他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精神状况出现问题（自述有幻觉和幻想），最终流落街头，开始长达 16 年的流浪生活。孙先生的故事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成为华人社会反思美国无家可归问题的一个切入点。

无家可归从来不是一道由单一事件触发的开关，而更像是一条缓慢松动、最终全面坍塌的链条。人们走向街头，是结构性压力与个人变故交织后的结果——失控的住房市场、工资停滞、经济不稳定、缺乏储蓄，再叠加疾病、家庭暴力、成瘾、失业、自然灾害或精神健康危机。这些因素单独出现时也许尚能抵御，但当它们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内相继发生，便像一连串相互推倒的骨牌，最终让一个家庭滑向城市边缘的一顶帐篷。

在整个加州，住房成本是被最频繁提及的那根“压垮性”骨牌。租金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工资，让许多低收入者即便日夜工作，也无法维持最基础的居住空间。当地经济学家常说，加州的许多城市早已没有所谓“入门级住房”。与此同时，经济适用房的长期缺乏让无数家庭没有任何缓冲空间——一次医疗账单、一场车祸、一段关系的破裂、甚至只是房东的一句涨租通知，都可能成为家庭生活的分水岭。更雪上加霜的是，许多人在危机来临时缺乏亲友网络支持，只能独自面对持续下滑的生活轨迹。

美国在 2024 年记录下史上最高的无家可归人数，而加州数字最为刺眼——超过 187,000 人，占全国近四分之一。温暖的气候确实让户外生存稍显可行，而相对友好的社会政策也吸引一部分人来寻求依靠。但最具冲击力的并不只是数字，而是露宿街头的比例：约三分之二的加州无家可归者居住在户外，占全美街头露宿人口的近一半。湾区九县共有超过 28,000 人正在经历无家可归；旧金山近年来的数据显示，虽然庇护床位增加降低了街头露宿人数，但总体无家可归人口仍在增长，足以说明住房危机的顽固程度。

这些数据如果没有真实的场景支撑，仍会显得抽象。可现实随时会在你意外的地点出现。我偶尔会去家附近的县立公园远足，那里的树林安静得像隔绝于城市之外。然而在通向溪谷的一座窄桥下，却常常能看到几顶并排的帐篷。有时还能看到自然风景与生活用品奇异并置：一件湿衣服搭在树枝上、一个旧椅子被生锈的锅子压住、一辆坏掉的购物车半沉在泥地里。在这样干净的自然空间里，它们显得突兀，却也真实而沉重。这些景象提醒人们：无家可归不是城市中心的独占问题，而是蔓延整个地区的深层伤痕。

在圣何塞，情况同样如此。瓜达卢佩河沿岸——尤其是泰勒街与 I-880 公路之间、哥伦布公园附近——长期以来都是流浪汉营地的聚集地。即便市政府持续推进清理行动，河边依旧不断出现新的帐篷，仿佛一场永远追赶不上的循环游戏。清理一天，新的营地就可能在另一段河岸重新搭起。

疫情期间，加州州政府曾紧急购入或租下酒店，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临时居所，并配发电子设备，以确保他们维持与家人、社工及外界的联系。一些学者认为这些措施在短期内确实减少了街头人数，也让许多人第一次在多年后拥有一张干净的床。然而，这一政策随即引发广泛争议：批评者认为成本高昂、执行混乱、监督不足；支持者则强调这是少数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公共政策。随着紧急资金耗尽，大部分人再次被迫回到街头，而围绕这些项目的争议也从未停歇。我参加的每一次聚会，都会不经意间触及到这个充满争议的话题，并引发激烈的争论。

更复杂的，是加州无家可归政策几乎都裹挟着州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长期摩擦。州政府推动统一策略，要求扩建庇护所、增建支持性住房，并敦促各城市承担明确的责任；地方政府却经常担心居民反对、预算紧张、治安问题，并对州政府的要求难以完全接受。旧金山与州政府之间关于“先提供床位”还是“先清理营地”的争论持续多年；洛杉矶市议会批评州拨款不透明，州长则反击地方执行力低下。各种政策像是在不同层级的政治结构之间被反复推来推去，而真正生活在街头的人，却无法等待哪一方先取得胜利。

公共支出同样成为巨大的争议焦点。加州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处理无家可归问题，但成效始终备受质疑。建造一套支持性住房的成本动辄 50 万至 70 万美元，甚至更高；庇护所的人力与管理成本庞大；精神健康服务、戒毒治疗、街头巡护、危机干预等项目也持续吞噬预算。一些批评者认为钱花得不合理，项目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投入不足才是问题的根源——“没有人会抱怨消防队太贵，只有房子烧毁时你才会知道资源的不足”，一位社工曾这样说。

在政治层面，争论更加复杂。在疫情前，许多民主党城市坚持“住房优先”理念，强调公共卫生和人权，反对大规模驱离。而共和党阵营——包括特朗普时期的联邦政策——则主张更强硬的执法与清理。但近几年，这些界线开始模糊：民主党市长在选民压力下变得更倾向清理街道，而部分共和党地方政府则开始强调增加治疗与康复资源，而非单纯惩戒。无家可归问题因此不再只是“社会困境”，而成为美国政治中最尖锐的治理考卷之一。

最终，大多数人并不是突然间跌入无家可归的境地，而是逐渐滑入。经济结构让他们站在悬崖边；个人变故则让脚下的土突然松动；政策争论与政府间的摩擦让救援变得缓慢甚至缺席；公共开支的争议让社会难以决定下一步的方向。于是，那些在街角、河岸、桥下、林地中反复出现的帐篷，成了整个社会结构张力的外化象征——提醒着我们：无家可归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土地上，一道尚未被修复的裂缝。

26

小心异地奇法

部 III

美国的法律体系常被形容为一张层层叠叠的网：联邦、州、县、市四个层级交叉运作，远看井然有序，近看却复杂得足以让外来者——甚至美国人自己——时常感到困惑。表面上，它体现了一种从上而下的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运作中，这套体系更像是一幅“拼布式”的法律地图：边界密密麻麻、色块互不相同，甚至可能在毫无过渡的情况下从一种规则骤然跳到另一种规则。一个在 A 州完全合法的行为，只要跨过一条分州公路，到了 B 州就可能变成轻罪；在某些地方，地方法令能带来让人哭笑不得的后果。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面积达 50 平方英里的无人居住区域经常被引用作为例子，在理论上，这片区域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死亡地带”[1]。对个人而言，美国法律既是一套结构严谨的宪政体系，也是一座随时可能踩到冷门条款的迷宫。

这种复杂性来自美国的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享权力，联邦法拥有最高效力——这是《最高条款》赋予它的地位——但宪法同时又严格限制了联邦的权力范围，把大量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事务交给州与地方政府。这就造就了美国独特的“多中心法律生态”：同样的行为，在不同州、不同县，甚至不同城市，法律后果可能大相径庭。

联邦法律适用于全体居民，涵盖移民、税务、破产、专利、跨州犯罪等领域，由 FBI、DEA、CBP 等联邦机构执行，并在联邦法院审理。州级法律则几乎覆盖生活的全部细节——婚姻、离婚、收养、学校制度、财产纠纷、合同、绝大多数刑事法规。“县”和“市”则承担更细化的行政职责，从选举、福利、道路、监狱，到警消系统、分区规划、停车与噪音，几乎无所不包。

理论上，四级结构井然分明；但在现实里，这种“分层 + 自治”的制度反而制造了大量不可预期的状况。

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这种复杂性，是许多年前一次去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商务出差。当时正值夏季，地面热到足以让鞋底粘住。我们几位租了辆车准备轮流开，结果一位同事却死活不肯坐上驾驶座。

“我不能开车，”他说，“我上次来乱穿马路被记录在案，现在名字在系统里，我得避免被警察查到。”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乱穿马路在我印象中不过是个最多罚几十刀的小事——怎么会严重到连租车都不敢？他摊着手说：“亚利桑那地方法规很奇怪，别招惹。”

听起来像都市传说，但在美国，这种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一些地方确实会把轻微违规记得非常“认真”，而这些记录又会在州与州之间、县与县之间的差异中产生长期的连带影响。

这种经验让我想起毕业时收到的一份工作邀请，地点在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那时我听到过太多关于当地“奇葩法律”的传言：

—“戴着假胡子去教堂，如果让别人笑出来，就是违法。”—“蒙着眼开车是非法的。”

[1] 黄石国家公园内有一片面积达 50 平方英里的无人居住区域，延伸至爱达荷州境内。理论上，这片区域是一个“死亡地带”，身处其中的人可能可以逃脱重大犯罪的起诉，即使是谋杀罪在这里也能逍遥法外。该区域属于联邦管辖范围，具体由美国怀俄明州地方法院管辖，而该法院的管辖范围独特地涵盖了三个不同的州（怀俄明州、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

这些传闻荒诞得近乎滑稽，却也让我犹豫。我虽然从未认真查证，但那种对“陌生法律文化”的隐隐不安最终让我放弃了那份工作邀约。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奇怪的法律，有些确实存在但从不执行；有些则是民间的讹传。但也确实有不少非常古老、实质上已经失去意义的条例，依然安安静静地留在美国的法典里，宛如某种历史遗迹。

比如，湾区帕洛阿尔托市就有一条条例：禁止“在墙壁等垂直表面上溜冰”。它看起来像是从黑白无声电影里遗落下来的场景，几乎让人无法想象当年立法时的社会背景。

这些看似荒诞的法律背后，是美国自治传统与法律层级长期叠加的并存产物。一方面，地方自治激发了制度的活力，使不同社区能够制定适合自身需求的规则；另一方面，数百年累积下来的各类法规彼此叠加、偶有冲突、时常过时，却不一定会被及时清理。

在这张法律拼布图中，人们既享受自由，也必须谨慎。某个地方视为“天经地义”的行为，在另一个地方可能完全无法解释。对许多外来者而言，美国法律不是一条直线向前的高速公路，而是一张随时可能岔路的小路网络——你永远不知道转过一个街角，会撞见一条还在严格执行的条例，还是一项已经无人记得的法律遗迹。

而正是这种层层叠叠的不确定性，让美国形成了一个重要的职业生态：律师。面对如此庞杂的法律结构，我们之所以需要律师，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够聪明，而是因为这套体系本身复杂到难以靠常识应对；每一个小小的决策，都可能跨越不同层级、不同辖区的规则边界。

换句话说，在美国生活，你不仅需要一张地图——你需要一个“法律向导”。这，也许就是美国法治文明最现实的一面。庞大、复杂、自洽，却又充满不可预测性；令人敬畏，也让人无可奈何；它的魅力与陷阱，往往就在同一个条文里。

PART IV

落叶的余温

生命里总有一些人，像季节里最明亮的叶子——落下之后，世界便安静了一大半。他们离去得悄然及突然，但余温仍在：藏在泛黄的信纸背面，停在旧照片里不经意的微笑，或在夜深时一瞬闪回的声线。那些我们没来得及说完的话、握得不够久的手、以为还会继续的寻常，都随着落叶一起沉入土壤，却在记忆里悄悄发芽。这里写的既是关于告别，也是关于留下——因为我们之所以仍能向前走，是因为他们曾在身边轻声地陪着。

27

妈妈的黄昏

部 IV

那年初夏，我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被紧急召回。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发抖，却尽力压着情绪，只说了一句：“尽快回来！”放下电话时，我就隐约知道事情不妙。胸口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我给老板发了封匆忙的邮件，连夜订了飞往中国的机票。登机口的灯光冷冷的，我坐在椅子上，脑海里反复闪着母亲的样子，却每一次都被未知的恐惧覆盖。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沉重，心却像压着一块无法挪动的石头——沉得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令人窒息。

果然，到家后发现母亲已被送进了急诊室。

大约 10 年前，她夜里起床去上厕所时出了意外。那天她在乡下参加亲戚婚礼，睡的是老式的土房子。洗手间建在屋外，昏黄的灯泡勉强照着路的一角。她脚下一滑，重重摔倒。脚趾骨断裂，对年轻人也许算不得什么，但对她那样年纪的人，却是一道难以跨过去的坎。

自那次事故后，她的行动能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一年不如一年，走路变得小心翼翼，后来干脆整日卧床。身体一旦被迫停下来，就像被时间悄悄掏空。肌肉萎缩、呼吸浅弱、精神迟缓。她仿佛在那几年里慢慢减淡，像一幅正在褪色的画。

我过去通常隔一年回去探望一次，可这次电话来的太急。我几乎是在本能驱使下收拾行李、买机票、过安检，整个人像被抽离了意识，只剩下心里不断敲击的那句话：快回去。

回到医院后，我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糟。她半昏迷，时而有意识，时而沉沉不醒。睁眼的时候，她似乎认识我，却发不出声音，只能微微动动嘴角。那样的眼神，比任何一句话都让人心碎。

连续一周，她都没有好转。我与负责她的医生开了几次会，医生们语气平和，却难掩无力。他们尽力用最温和的方式告诉我事实：她不能再继续留在重症监护室了，需要转到临终关怀。

那是我人生中做过最沉重的决定之一。签下名字的那一刻，我的手在抖，却无处可逃。医院为她安排了一间单人病房，我睡在同一房间的另一张床上。让她能够安静地待在那里，不被其他声音打扰，像是希望她能体面地告别。

偶尔，当我们和她握手时，能感觉到她微微回弹了一下。那力道轻得几乎像是一阵风，却又真实得让人不敢呼吸。

那时，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也仅限于这些——一点几乎被时间磨到透明的回应，一点从身体深处挣扎出来的存在感，像暗夜里忽明忽暗的微光，虽然微弱，却提醒着我们：她还在，她仍努力与这个世界保持着最后的联系。

我们抓住的，是她残余的力量；而我们放不下的，是她曾经的模样。

从那之后，我感到绝望和恐慌，我的情绪开始像一条断了线的船，飘到哪算哪。吃饭时会突然哭出来，有时是在家里，有时是在朋友围坐的一张桌子前。眼泪来得毫无征兆，就像身体替我完成了我理智不敢承认的事情。毕竟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面对亲人离世的痛苦。

有人说：“对死亡的恐惧，是宗教之父”[1]。那段时间我终于理解了。

我祈祷，向上帝祈祷，希望奇迹发生——哪怕只是一点点，让她再清醒一会儿，再看看我们，再说一句话。可是奇迹终究没有来。将近一个月后，母亲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在她漫长而微弱的像潮汐一样呼吸中，我们儿女陪伴她走完了最后的半小时。没有挣扎，没有告别，只像一盏油尽的灯，轻轻地灭了。

母亲是典型的中国女人，不识字，却勤劳、谨慎、心思细腻。我是她第二段婚姻的孩子。她前一段婚姻生了几个女儿，在那个重男轻女观念沉重的年代，这竟成了她被指责、被嫌弃的理由。那种压在女性肩上、沉重而荒谬的命运，我后来想起仍感到心痛。是时代辜负了她，而不是她辜负了谁。

我出生那天是个男孩，这应该让她松了口气，也让她摆脱了许多原本要落在她身上的不公。我虽然不是绝顶聪明，但也不算愚笨糊涂，老辈子喜欢的看相也指向有不错的未来。所以她对我寄予了希望，但却从不强求，只是默默支持，默默守着。

父母一生辛苦，“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他们那一代人，经历过太多我们无法想象的苦难，却依然在努力让下一代过得好一点。不论我们今天的生活有多少来自自己的奋斗，都有另一半来自他们为我们挡下的风雨。

在我妹妹的照顾帮助下，母亲晚年有十几年相对平静安稳，我一直为此庆幸。至少她不是在最难的时候离开的，而是在一个稍微温暖一点的世界里。

如今，我已不再像当年那样悲伤得无法自拔。时间没有治愈我，却让我学会与失去共处。我相信，无论我们后来走到哪里，总有一天会在某个地方重逢。我希望到那时，她还能认得我。

处理完她的后事，把她安葬在故乡的土地里之后，我回到美国，才得知自己所在的创业公司破产了。

真是如此——人生的风雨常常不会单独来，落叶也常常不是一片，而是一阵。墨菲定律说得没错：凡是可能出问题的，终究都会出问题。

但生活还得继续。带着那些落下的叶子，带着那些化成温度的记忆，带着那些曾照亮过我们的爱。

母亲的黄昏落在了我的生命里，而那余温，会陪我走很久很久。“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在未来漫长的道路上，我知道自己仍会时常想起她。想起她曾轻轻拍着我后背的手，想起她为了家庭忍耐的沉默，想起她一生的隐忍与柔软。

我愿相信，在某个我们无法抵达的地方，她已经安宁；而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走下去，继续替她活出更明亮的日子。

毕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

[1] ”Fear of death is the father of religion”: 这句谚语广为流传，通常被认为是作家厄普顿 · 辛克莱 (Upton Sinclair Jr.，1878 年 9 月 20 日—1968 年 11 月 25 日) 所说。他是美国著名左翼作家，出生于巴尔的摩，曾经创作超过 90 本著作，并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肯定。

28

早夭的腊弟

部 IV

我小时候，大概刚上小学不久，母亲又生了一个儿子。那是我们家的第二个男孩，让母亲心里那份“我能生男丁”的笃定变得更加牢固。在那片贫瘠的土地、那个讲究传宗接代的年代里，这份笃定并不是荣耀，而是攸关一个女人地位、命运乃至未来生活的一层脆弱保障。仿佛命运终于愿意在她面前，点亮了一盏微弱却珍贵的灯。

按照湖南老家的习俗，孩子出生在农历腊月，父母便亲昵又带些玩笑地叫他“腊妹子”。于是，我的弟弟自出生起，便拥有了这个带着浓浓乡土气息、既软糯又耐人寻味的名字。

那大概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子贫穷得很，既没有书可读，也没有玩具可玩，但因为有了他——那个刚学会跌跌撞撞行走的小腊弟——整个家都亮堂了几分。

他是家里的开心果。他的笑声清脆，像能把屋子里积了多年的苦气一口气吹散。他捏着我的手指学走路，扑倒在我怀里时带着奶味的体温，那些微小的瞬间，如今回想起来仍像透亮的碎金，嵌在记忆深处，永不退色。

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荒凉的年代，正是他，用最简单的方式，给了我们一家人最纯粹的快乐。

说起来，他或许是我们家最聪慧的一个，虽然不是”未满三朝已食牛”，但是我们还在等他”溪头卧剥莲蓬”呢。他眼睛亮得像黑夜里的一点火星，常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超越年龄的灵气。有时我甚至觉得，他才是真正的“神童”，而我反倒比不上他那自然流露的天分。可惜，命运从未打算让这种灵气长成参天大树。

腊妹子大约两岁时，有一天突然发起高烧。那时候医疗匮乏，乡间人家最常依赖的便是走村串户的赤脚医生。医生来家里看了几天，他的烧不仅没退，反而节节攀高，把屋里的空气烤得焦灼不安。父母这才慌了，决定把他送往农场医院——那可是当时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国营农场，人们总说，那里的医院条件已经算是很好的。意思无非是：送到那里，孩子应该就稳了。

然而，命运似乎只是让我们多看了几天虚幻的希望，然后又将它无情收走。

不到一周，父母就回来了。但只有他们两人。

腊妹子，再也没有回来！

那天，父母推开门的情景，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像被风吹干了灵魂，只剩下一副疲惫的躯壳。眼神浑浊而空洞，仿佛刚从深渊里踉跄爬回，却依旧不知该如何重新站稳。

我从大人们低低的嘀咕中听见：弟弟没救回来，被埋在医院附近的小公墓里[1]。

那片土地离我遥远得几乎无法想象，却从那一刻起，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永远阴沉的一角。

随后的几年里，父亲常常自言自语，像是在和空气、和天、或是和命运较劲。他说自己被诅咒了。他说那年春节，有人向他借了一张床，正是那张床带来了霉运。

那时的我不懂，只觉得这些话像雾一样飘忽，伸手触不到，也理不出头绪。长大后再回望，

[1] 未成年夭折的孩子不能葬在家附近，这是湖南的一种传统习俗。

我才慢慢明白——那既是迷信，也是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把无处安放的痛苦托付给命运的一种方式。因为比起承认“我们无能为力”，把悲剧归咎于“命”，似乎更容易继续活下去。

母亲则完全不同。她沉默得像一口深井，安静得听不见回声。她不哭、不吼、不怨，只是偶尔在拂晓或深夜，轻轻叹一口气。那种叹息几乎无法被听见，却能让空气瞬间变得沉重。

她一生生了八个孩子——六个女儿，两个儿子。但最终，只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活过了十岁。其他所有的小生命，都像被无情的风吹灭的灯火，来不及亮透这个世界，便匆匆坠入黑暗。“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这不仅是她个人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对贫穷、疾病、意外和弱者毫无怜悯的时代。

在那样的岁月里，孩子的生命脆弱得像薄纸；命运随手一按，就能让一个家庭坠入无底的深渊。

而她，只是千千万万普通女人中的一个。生活对她而言，从来不是道路，而是一场永无休止的考验：贫瘠、饥饿、缺医少药、沉重的劳作、突如其来的疾病、无法选择的命运……所有的重担都像山一样压在她肩上。她的每一次怀孕，都像是一场押注生命的赌博：赌的不是孩子能否长大，而是能否活下来。“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她的悲伤无处安放，只好被埋进生活的缝隙里：埋进灶前的烟火、埋进深夜潮湿的空气、埋进她沉默得像岩石般的背影里。

生活对她来说，真的太过艰难，太过残酷。

那时的我还不懂死亡意味着什么，只觉得家里忽然少了一个小小的影子，而大人们的世界里裂开了一个谁都不敢碰的缺口——一个永远无法补上的缺口。

直到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腊妹子的死，或许根本不是诅咒，也不是某种天罚或宿命的惩戒。更大的可能，不过是那个年代医疗匮乏、条件有限所造成的悲剧。可在那样的时代，人们无法把悲伤归于现实，只能归于命运。因为“命”，是唯一能解释一切、又永远不会回应人的东西。

而腊妹子，就这样停留在我们家的记忆深处——永远是那个两岁的孩子，永远来不及走进生命的下一年。

命把他带走得太早，却把那一段微弱的温暖留在了我的一生里。

29

异乡的送别

部 IV

那是我来到美国西海岸攻读博士学位不到一年的时候。初夏的阳光明亮而不炙热，空气里弥漫着青草与新叶的气息。校园的林荫道上，微风拂过，光影摇曳。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里克的邮件，短短几行字，却让我心头一紧：

“迪克昨天去世了。追悼会将在两天后举行。”

我怔在电脑前，几乎不敢相信。那一刻，仿佛有一股冷流从背脊爬上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迟迟没有落下。我立刻将邮件转发给我的导师和他的老板，我们三人商量后，决定驱车前往参加追悼会。

那天午饭后，我们启程了。沿着州际公路一路向北，驶入华盛顿州，前往温哥华。那不是加拿大的温哥华，而是美国境内同名的小城。阳光透过薄云洒在公路上，远处的农场闪着柔和的金光，空气温润，带着青草、尘土与初夏麦穗的气味。

车刚驶入通往农场的小路时，我们看到左侧驶来一辆高大的拖拉机。驾驶座上竟是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他神情专注地操控着方向盘。我惊讶地问导师：“孩子也能开拖拉机?”他笑着摇摇头说：“在这里，没有警察管这些。乡下人早熟，也自有他们的规则。”那是我那天遇到的第一个惊讶，关于生活与自由的惊讶。

追思仪式在傍晚举行，地点就在他家庭农场树林的一侧的草地上。那片草地辽阔而宁静，阳光透过树影斑驳地洒在众人身上。微风吹过，带着干草和泥土的清香。我只穿了一件薄外套，风掠过时并不寒冷，却让人有种难言的空落感。

我已记不清仪式的每一个环节，只记得当他的一位同事开始介绍迪克的一生时，我的思绪慢慢飘远，回到了我们初次相遇的那个时侯。

那时我还在中国。我与老板及几位同事一起去昆明机场迎接他们的三人团队和仪器设备。他们此行是为了学术交流，而我则担任随行翻译。也因为他们的到来，我的硕士论文答辩被提前两个月到五月初，让我意外地多领了两个月的工资。

我记得那天早上我刚刚完成答辩，中午和同学匆匆吃了顿庆祝饭，下午就被叫上车，直奔火车站，从此开始了与他们为期数周的合作与旅程。

迪克、凯文和里克三人组成的研究小组，认真、谦和地在云南的研究站穿行。他们拥有高端电子设备,我们的团队则拥有丰富的领域知识和实地数据,双方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们与我们分享知识，也让我学到了如何更自然地用英语表达。那是我第一次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长时间共处，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交流”意味着什么。

几年后，我申请美国的博士项目时，迪克成了我的推荐人之一。他毫不犹豫地为我写下那封推荐信，详细描述了我在云南的工作与研究潜力。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支持，我不可能那么顺利获得那份涵盖学费与生活费的全额奖学金。那一年，全校只有两位新入学中国留学生拿到这样的资助，而我恰好是其中之一。

然而，命运总带着反讽的意味。来到美国后，我却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他永远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在云南阳光下戴着棒球帽、微笑着与我们讨论研究细节的中年人。

仪式上忽然传来笑声，把我从回忆中拉回现实。原来是一位同事在讲述他们几年前去日本出差的趣事。那晚他们在东京银座的酒吧里喝得酩酊大醉，账单数千元，第二天醒来后，大家为如何向妻子解释而发愁。话音刚落，众人忍俊不禁，笑声此起彼伏。

那是我那天的第二个惊讶。原以为追悼会该是肃穆而悲伤的场面，没想到，现场却洋溢着笑声与温情。那笑声里没有轻佻，只有怀念。仿佛人们相信，只要笑着谈起他，他就仍在我们身边。

仪式结束后，人们在草地上举杯。啤酒、红酒和简单的食物摆满了桌面，初夏的风柔和地吹拂着人们的脸庞。有人说，这才是他希望的样子：不必哭泣，不必矫饰，让笑声为他送行。

然而，笑声在我心里却久久散不开。当我望着那片被落日染成金色的草地，一种深深的孤独感突然涌上心头。那种失落不是突然而短暂的悲痛，而是一种缓慢、持续、无法排遣的空缺. 像被挖去的一部分记忆，永远无法复原。

我在心里轻声对他说：“谢谢你。”谢谢他在我最迷茫的时候，给过那封信、那段话、那份信任。赴美留学后，我们之间有过电子邮件交流和问候，但从未再见面。人生有太多来不及的善意，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

回学校的路上，夜色缓缓笼罩公路。导师轻声讲起迪克的往事，语调平静，却让人心酸。车窗外的灯光一盏盏掠过，像时间的碎片，提醒着我，那些善意与帮助，如今都成了无法回报的记忆。

那之后的一个月，我一直情绪低落。没有向任何人解释，只是一个人静静度过。夜深人静时，我常独自走到校园外的小径上，看星光洒落在草地上，听远处的风掠过树林。那种孤独感像潮水般涌上来，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 在异国他乡的求学之路上，死亡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次真实的、不可逆转的离别。

我常常想，如果有灵魂或来世，他是否会在另一片草地上微笑着，仍在讲笑话、举杯，与朋友们谈笑风生。或许，他已经成为那阵风、那道光，在每个初夏的傍晚，轻轻拂过我们身边。

如今，每当初夏来临，微风拂面，我总会想起那片林旁草地、那阵轻风、那一群笑着的人。那笑声穿越时间，成了我记忆中最温柔的一道回响。

30

不忘旧师恩

部 IV

当我听到何老师去世的噩耗时，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我只觉得胸口一紧，悲痛瞬间淹没了我。她还不到七十岁，据我所知，她一向身体健康，从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直到后来我才得知，她是在一次突发性心脏病中离开的——在急救人员赶到之前，她已经停止了呼吸，尽管她家离当地医院不过几分钟的路程。

我仍记得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情景，大约就在一年前。那时我回老家陪伴母亲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整整一个多月。那时她已经退休了，我去她家拜访之后，她还是特地来医院探望了我的母亲，我们在病房外聊了会儿，她看上去比以前瘦了一些，但依旧平静安详。她的声音仍然温柔，说话慢条斯理，眼角带着一如既往的笑意。我不记得我们具体聊了什么，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她的神情——那份温暖与善良，从未改变。

在那年我再度离开中国之前，我最后一次去她家拜访。谁也没想到，那竟成了永别。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也几乎没有再联系。那时国内的互联网还远没有普及，而我在美国习惯了电子邮件之后，也渐渐懒得再写纸质信件。然而命运偏偏就在这种疏忽之间，把人永远地带走了——毫无预告，也来不及说一声再见。

我与何老师的缘分始于高中刚入学的时候。她成了我的数学老师。高一那年，她意外地任命我为班级数学课代表，尽管班主任原本把这个职位给了另一个同学。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我初中最后一次考试时注意到我，觉得我数学基础不错。以我当时对学习的敷衍态度来说，这多少算是一种运气。但无论如何，她认定我在数学上有潜力，于是毫不犹豫地把这“职位”给了我。这样我就稀里糊涂地当了半年班级数学课代表，直到开始了我混乱的的高中学习 (详见：另类高中岁月)。

从那以后，我们的接触多了起来。我每天负责收集班上的数学作业，交给她批改，再把批改好的作业分发给同学们。她带我和两位同学一起参加了国营农场的数学竞赛，我拿了第三名，那成绩甚至让她有些惊讶——当然，更惊讶的可能是我自己，以及那些熟悉我“吊儿郎当”样子的同学们。我几乎还能回忆起那天下午从公车站回学校路上，她微笑看我兴奋地唠叨的情景。

她鼓励我继续参加更多更大的比赛，也耐心地辅导我备战。当我受邀参加市级数学竞赛时，我再次意外地获得了第三名，让包括教育官员和其他老师在内的许多人对我刮目相看。

从那时起，大家对我的期望都高了不少。学校甚至允许我自由安排学习时间，不再要求我参加所有常规课程。按理说，我应该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但少年时的轻狂与散漫，常常让人错失本该抓紧的东西。我花了更多时间在篮球场上，而不是学习室里，虽然我的投篮技术确实因此提高了不少。至于省级数学竞赛，我最终默默无闻，名落孙山没有取得什么成绩。我知道那曾让她多少有些失望，但她从未责备我，只是在下一次见面时依旧温和地鼓励我。

后来我转学到另一所学校准备高考，但她仍然和我保持联系，不时给我寄来鼓励和建议。她曾对我说，无论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数学都会是我一生受用的工具。事实证明，她说得一点都没

错。无论在学校还是在职业道路上，我时常凭借扎实的数学基础受益良多。而这份基础，是她早早为我打下的。

从大学到研究生到留学再到工作，每次回老家，我都会抽时间去看望她。她永远那样亲切、温柔，像是我生命中另一个母亲。

听她偶尔提起，她年轻时家境本不差，却因日本侵华战争被迫随家人逃往贵州度过了艰难的童年。二战结束后，她回到湖南，后来考入了著名的湖南师范大学学习数学教育。文化大革命期间，她作为教师，无奈地将年幼的孩子送到农村多年，生活一定极为艰辛。可她却从未向我抱怨过一句。她总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热爱数学，热爱学生，几十年如一日地把所有耐心与善意倾注在教学中。

这些年来，每当别人提起“老师”这个词，我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的笑容——温暖、明亮、毫无保留。上次清明回国，我去看了她和她的丈夫罗老师，在他们安息的墓地献上敬意。碑上的刻字写着她的一生：1937—2006。短短几数字，却承载着一位教师的风骨、一生的善意，以及无数被她影响过的学生。岁月会带走生命，却带不走一个人留下的温暖；离别会让人悲伤，但不会抹去那些被点亮的未来。

何老师，这些年，每当我在人生的岔路口犹豫不前，或在工作、生活中遭遇困惑时，我总会自然地想起您的身影——那份从容，那份耐心，那份不急不躁的微笑。尽管您早已离开人世，但您在我生命里播下的种子从未消失；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悄悄生长，成为我面对世界时的一束光。

如果没有您的启发，也许我永远不会意识到数学背后的那份纯粹与逻辑带来的美；如果没有您的鼓励，我可能难以在年轻的迷惘里找到方向；如果没有您在那个年纪给予的信任，我也不会懂得，一个人被看见与被期许，是何等珍贵的礼物。

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宁、喜乐，没有病痛，没有忧虑。愿您所有的善良都化作清风，永远守护在那些被您教过、爱过的学生身边。愿我们在漫长的岁月尽头，能以另一种方式再度相见。学生虽不成才，却永远怀着最深的敬意与思念。您的教诲未曾远去，您的光仍照亮着我前行的路。

桃李随风渐行远，
门墙依是旧日春。
再思故园泥泞路，
不见当时引途人。

31

东京的故人

部 IV

今天是 2025 年 11 月 8 日，加州秋季一个寻常的星期六[1]。阳光温柔，空气清透，风从山谷缓缓吹来，带着干枯树叶的香气，在窗外的金色树影间轻轻打着旋。我坐在书桌前，忽然意识到：距离 2016 年 11 月 8 日，整整过去了九年。

那一天，特朗普先生当选美国总统。美国的天空似乎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浪潮卷入，有人兴奋，有人愤怒，有人沉默不语。电视、广播、社交媒体都在喧嚣，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世界寻找解释。

然而，对于我们微信群里那一小群老朋友来说，那一天却因另一则消息而永远被定格。就在选举尘埃落定的那个夜晚，我们失去了亲爱的朋友：康！

那是一条突如其来的噩耗。群里的一位多年未联系的老同学说，听说康在日本去世了。没有细节，没有证实，只有那短短几句话，像一阵冷风，穿透了所有人的心。

我立刻上网搜索，找到他所在的研究机构网页，给他的几位同事写了电子邮件，语气克制，却止不住颤抖。几个小时后，东京传来确认：康在公寓中离世，因突发心脏病，周围没有任何人。那一天，正是 2016 年 11 月 8 日。

康来自重庆，那座山城赋予了他一种温润与坚韧并存的气质。他 1983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最初学习地质学，后来改攻生物工程。1989 年赴日本深造，1995 年获大阪大学博士学位后正式加入东京理化研究所[2]，在视觉神经科学领域耕耘多年，以灵长类与人类视觉研究而闻名。

他有一头很不寻常的卷发，总是微微蓬松，笑起来时，眼角轻轻弯起。他话不多，却有一种安静的自信；从不炫耀，却让人信赖。许多女孩喜欢他。但他总显得有些超然，仿佛更愿意与思想对话，而非沉溺于情绪。在中国的时侯，我从没见过他的女朋友，如果他当时有女朋友的话。

足够有趣的是，他是我们那群老朋友中最后一个结婚的，妻子是日本大学教授，也曾经是他的同事。可以说是最稳重、最沉静的一个了，或者藏得最深的?!

八十年代的成都，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的转折点。在宿舍、茶馆、餐厅，我们谈梦想，下围棋，打桥牌；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也在烟雾缭绕的茶杯间酒桌上，规划着未来的模样，“诗酒趁年华”。后来，大家各奔东西——有人去了美国，有人去了日本，有人留在加拿大，有人留在欧洲。康留在日本，成了异乡的科学家，但他始终没有与我们疏远。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们又在美国重聚多次。硅谷的阳光下，西雅图的细雨里，我们在海湾的沙滩上漫步，也曾登上太空针塔眺望。在餐桌旁高谈阔论，斗嘴调笑；对酒当歌，开怀畅饮；既谈学术，也谈人生，闲时还对弈围棋、切磋桥牌。无论何时，他都从不急躁，语气温和，带着让人安心的从容。事实上，许多聚会都是由他牵头促成的。他常因学术访问来到美国，也常以朋友的名义，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我们重新聚拢。

---

1 谨以此文，怀念一位远方的朋友。九年时光已逝，但他留在人间的温度，从未消散。

2 理化学研究所（RIKEN）是日本最大的国家级综合性科研机构，研究领域广泛。如中国科学院（CAS）在中国，当然中国科学院规模更大。

他的去世，是我们生命中一次沉重的打击。那时的我们，仍以为人生很长。可以再多聚几次，再多喝几杯酒。可命运总在不经意处转身，让人来不及道别。

康的生命，像他研究的光与视觉，悄然点亮过无数人的心。他的学生、同事、朋友，都在网络上写下悼文与回忆。那些文字里，有敬意，有泪水，也有温度。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他走得多远，而在他照亮了多少人。

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夜里，我写下了一首小词，为他而作：

采桑子 · 悼康兄

悲友中年入夜台，醒是泪啼。
醉更凄迷，孤灯浊酒沥往昔。
絮飘秋残风又西，相思漫季。
明月不沉，惊天动地再一生。

写完后，我久久望着窗外的夜空。风吹过窗棂，银杏叶飘落，像记忆中那一年成都的风，也像他沉静的微笑。没有告别，却从未离开。

九年过去，落叶仍在。加州的秋天依旧金黄，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木香。每当风起，我总会想起东京有座静默的公寓，那里的窗外，也应该有银杏叶飘落，在街灯的光下泛着金色的微光。

我时常想，也许康就藏在这风里，在太平洋的另一端，与这边的秋风一同流转。他或许正笑着看我们，像从前那样，温和、含蓄，不言不语，却在场。

他的生命，如秋叶般静美，轻轻坠落，却仍在风中发着余温。在东京，也在加州，在记忆的深处，他从未真正离开。

32

二战的纪念

部 IV

大多数人都明白战争的残酷，但很少有人真正直面它的后果。我们大多数人生活在和平之中，对战争的想象往往是抽象且遥远的。新闻告诉我们数字，电影给我们画面，历史书写下事件。但这些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观看风暴：你知道外面风雨交加，却依然身处一个安全、干燥的世界里。

这种理解停留在脑中，却难以抵达心里。

我曾以为自己对战争已经“明白”得够多了，我读过很多关于二战的书籍，也看过很多二战的影视。我的认知中有数字、有史实、有画面、有概念，可这些东西轻得像纸。直到我看到墓碑山的那天，我才意识到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其实从未真正沉入心底。

那是在檀香山。

那一年我去避寒，心情轻松，不带任何沉重的预期。珍珠港，那些刻在教科书上的事件，本以为只是旅程中的一个顺道风景停留。

我没想到，那片土地会在几小时内改变我对世界的感受。

当我在珍珠港看着亚利桑那号纪念馆静静浮在海面上时，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错位感——明明阳光灿烂，海水温暖得像丝绸，可这一切的美之下却沉着 1102 具遗体[1]。我站在那片海上，忽然说不出话。那种沉默不是礼貌，而是情绪卡在胸口难以发出来。

当我看到密苏里号[2]，看到曾在这里签下投降书的甲板，我心里莫名涌起一阵混合了敬意与苦涩的情绪。

人类竟然能把战争的开端与终点停在同一片海面上——这让人心里产生一种说不清的荒诞感。我甚至在当时微微感到恼火：为什么人类必须要经历如此巨大的死亡，才肯走向和平？

这一切情绪还只是波动。真正的冲击还在后面。

当地朋友带我们去了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3]。我原本以为那只是“另一个景点”。车一进入火山口，我心里突然升起一种莫名的不安。那感觉像踏入一片空气更沉、更厚的空间，连呼吸都显得慎重。

然后，我看到那片墓碑山。

---

1 著名的珍珠港事件发生于 1941 年 12 月 7 日清晨，是日本帝国海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的一次偷袭。日本的目标是瘫痪美国舰队，以确保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扩张。数百架日本战机对珍珠港进行了两波攻击，炸沉或损坏了多艘美国战列舰，包括“亚利桑那号”，并摧毁了大量飞机，造成超过 2400 名美国人死亡。这次攻击彻底改变了孤立主义的美国民意，次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标志着美国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2 1945 年 9 月 2 日，这艘标志性战舰在东京湾举行了正式仪式，日本帝国代表在舰上签署了投降书，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这艘以美国总统杜鲁门家乡州命名的战舰，被选为美国力量的有力象征和和平谈判的合适地点。在其柚木甲板上举行的简短而庄严的仪式，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致命冲突的终结。日本投降签字仪式上，共有九个同盟国代表在场并依次签字。中国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战胜国，代表中国签字的将军是时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陆军二级上将徐永昌。如今，“Mighty Mo”是停泊在珍珠港的一座浮动纪念馆。

3 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National Memorial Cemetery of the Pacific）坐落在檀香山市中心以北一个名叫庞奇包尔火山口 (Punchbowl Crater) 的死火山上，这里安息着将近 53,000 名士兵（和符合资格的军属）。

那是一幅无法在照片里提前预演的景象。整齐排列的白色墓碑，从脚下一直铺到火山口的顶端，宛如无声的浪潮，一波又一波向你涌来。

我愣住了。那一刻我甚至有种轻微的眩晕感，心脏突然落了一拍。原来，当死亡的数量达到某个规模时，人类的感知会出现短暂的失效，它不是痛，而是一种彻底的空白。

我听不到旁人的说话声，也听不到风声。我只是盯着那些墓碑，胸口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攥住。

那种震撼不是像雷一样轰然砸下，而是像潮水一样悄无声息地把你整个吞没。我站在那里，感觉自己的心被慢慢压低、压沉、压得几乎抬不起头。

然后，羞愧来的特别快。我突然意识到——我曾经用多么轻松的方式谈论战争。我曾用分析的语气讨论过战争起因，用平静的语调评价胜负与策略。那些自以为理性的讨论在此刻显得凡俗、浅薄，几乎是对眼前这些名字的冒犯。

我想象着那些铭刻在石碑上的名字背后，有母亲、父亲、伴侣、孩子……而他们曾经都像我们一样拥有喜欢的食物、喜欢的音乐、有惧怕、有渴望、有未完成的梦想。

我喉咙里突然升起一阵酸意，像是被情绪呛住了。

那些情绪混在一起：愤怒——因为战争总是以“必要”“正义”的名义出现；悲伤——因为每一个墓碑都代表一个被强行中断的未来；无力——因为我知道我无法改变历史，也无法阻挡发生过的死亡；敬畏——因为这里的每一个名字都在提醒我人类的脆弱与勇气。

我忍不住在墓碑之间走得特别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某种沉重的意义上。

那天回程的车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我开着朋友的车，我们沉默地沿着海岸线走。海水在窗外闪闪发光，我却觉得胸口沉甸甸的，像塞了一整片灰色的云。

那天之后，我再也无法以一种“抽象的距离”去谈论战争。那片层层叠叠的墓碑之山，像一道无法抹去的烙印，深深刻进了我的记忆。每当有人轻描淡写地讨论战争，把它当作战略、胜负或历史进程时，我的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冰冷的石碑，以及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灵魂。战争在那一刻不再是概念，而是具体而沉重的存在。

也正是在那时，我才真正理解了一代枭雄曹操在《蒿里行》中所描绘的战后景象，并非文学夸饰，而是对现实的直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些句子不再只是书页上的文字，而是与眼前的景象重叠在一起，提醒人们：战争留下的，从来不仅是胜负与荣耀，更是无数被湮没的生命，以及无法愈合的历史伤痕。“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从那时起，我反对一切战争。不是出于立场，而是出于心底的震颤——一种真实得无法退缩的感受。无论战争披着多么高尚的外衣，无论是谁声称它“不可避免”，我都再也无法接受它。

因为我见过那片白色的海。因为我曾站在那成千上万的墓碑之间，被它们的沉默击倒。

因为那天之后，我再也无法假装战争值得任何牺牲。

33

海格特墓园

部 IV

那是 2024 年新年后的几天，确切地说是 2024 年 1 月 5 日。离开伦敦前，我们决定去海格特公墓 (Highgate Cemetery, London) 参观——卡尔 · 马克思就安葬在那里。这是我们在里斯本游览之后，欧洲之旅的最后一站。我们原本想在圣诞节假期结束前前往，但公墓当时关闭了，于是推迟到了离开前的最后一天。

那天下午，伦敦的天有些灰，风带着冬日特有的寒意。我们在下午三点半左右抵达墓园，此前游览了伦敦东部，又辗转乘地铁与公交。公墓所在的街区安静、庄重，周围是古老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门前的铁栏杆上爬满常春藤。沿途的树木光秃秃地伸向天空，像一支支安静的手指，指向时间的尽头。

海格特公墓分为两部分：东墓园与西墓园。马克思的墓位于东墓园，那里以精致的维多利亚式纪念碑和墓碑闻名。我们从正门进入，支付门票。那天游客不多，也许是工作日下午的缘故。整个墓园一片寂静，只有风吹动枯叶的声音，偶尔传来几声鸟鸣。

进入墓园后，沿着墓地道路向左转，然后在下一个右转路口前，最引人注目的坟墓就是卡尔 · 马克思的墓。

高耸的基座上，是他巨大的半身像，目光深邃，仿佛穿透时间，注视着未来的世界。墓碑上刻着两句名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Workers of all lands unite.)”以及那句被无数人传诵的哲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The philosophers have only interpreted the world in various ways; the point however is to change it.)”

碑座前堆满了鲜花与花圈，有红玫瑰，有白菊花。那些花，有的已经枯萎，有的依然鲜艳，仿佛象征着人类对理想的信念——会凋谢，但不会消失。来自世界各地的访客——有的静默凝视，有的低声诵读碑文。那一刻，墓园里似乎没有国界，只有思想的回声，在冷风中延续。

我们在墓前站了许久。风从树林间吹来，落叶在脚边轻轻打转。我忽然想起年轻时的自己，那个满怀理想、相信知识能改变命运的年代。那一刻，我明白，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对话。

离开马克思墓之前，我低头祈祷。我祈祷世界和平，人人平等，祈祷他笔下那个“公正社会”的愿景，终有一天能在这片不平的土地上生根，而不必渡过一片血海。若他的灵魂仍在游荡，我希望他能俯瞰这片他深爱又批判的世界，赐予我们更多智慧与勇气——去改变，而非仅仅解释。

马克思的墓最初并不在此地。1954 年，为纪念他逝世百年，英国共产党筹款，将其墓从其他坟墓深处的一个地方迁至现在的位置。旧址仍保留着，那是一座极其朴素的坟墓，小小的墓碑，低矮的石栏，上面摆放着几束凋谢的花。我们在那儿停留了一会儿，仿佛那份简朴更贴近他一生的理想——“劳动者的尊严不在于墓碑的高度，而在于思想的深度[1]”。

之后，我们继续沿着蜿蜒的小路前行。石径两旁，密密麻麻的墓碑静静伫立。那些古老的碑

[1] The dignity of a worker lies not in the height of the tombstone, but in the depth of thought. —— 佚名

面早已被岁月侵蚀，文字模糊，苔藓与常春藤交织，在暮色中闪着深绿的光。空气中弥漫着潮湿与泥土的味道，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宁静。

我们走过法拉第[2]的墓，那座阶梯状的碑石寓意着知识的攀登与启迪。在另一处，我看见马尔科姆·麦克拉伦[3]墓碑上刻着那句话——“与其平庸地成功，不如轰轰烈烈地失败。(Better a spectacular failure than a benign success.)”我在心底轻轻念了一遍。它像是一种对生命的挑衅，也是一种对信念的赞歌。

我们还来到了乔治·艾略特[4]的墓前。那是一块质朴的石碑，四周环绕着几株矮小的灌木，泥土上散落着几片落叶。我俯身，用手轻轻拨开叶子，然后和家人一起——在墓前的泥土里，植入了随身携带的几支圆珠笔。那是我们献给一位伟大作家的敬意。墨水或许早已干涸，但那一刻，我仿佛听见文字在土壤下重新萌芽。也许，她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书写，继续为那些沉默的人发声。

墓园的石碑大多已有百年历史，时间让它们的棱角变得柔和，苔藓与藤蔓爬满字迹，仿佛岁月在上面低声祈祷。我看到几座华人墓碑，那些名字静静地立在那里，像是历史的一部分，也像是漂泊者的终点。

离开前，我回望墓园。夕阳正慢慢坠入树影之间，光线柔和，笼罩着整片墓地。无数墓碑在金色的光里静静伫立，像一群沉默的思想者，在等待时间的回答。

我忽然意识到——墓园并不是终点，而是一种延续。那些被埋葬的名字，仍在空气里呼吸。

也许，马克思早已前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阶级，没有斗争，只有平静的风与温柔的光，还有那些，永不熄灭的信念。愿他的思想不再只是被纪念，愿公正与平等，不再只是理想的名字。

如果他还在地球这个世界的附近，请看看天下苍生！

---

2 Michael Faraday,1791-1867, 英国物理学家，在电磁学及电化学领域做出许多重要贡献，其中主要的贡献为电磁感应、抗磁性、电解。

3 Malcolm McLaren, 时装设计师兼音乐推广人，1946 年—2010 年

4 George Eliot, 1819-1880, 英国小说家。她的作品包括《佛罗斯河畔上的磨坊》和《米德尔马契》》等。

34

落叶的秋天

部 IV

“史蒂夫去世了。”

那天傍晚，我刚散步回来。风从街角缓缓吹来，带着秋意的凉，卷起几片泛黄的叶子，在路灯下无声旋转着落下。邻居汤姆迎面走来，神情沉重。我停下脚步，他轻声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并不意外。过去的几周，一切迹象都像在悄悄预告。

史蒂夫家的院子早已变得空荡。那片他亲手栽下、悉心照料二十多年的竹林消失了，花坛被清空，只剩下一排干净的花盆，整齐地叠放在墙边。汽车被罩上了防尘布，几件旧家具随意地摆在门口。那种安静，带着一种不言而喻的终点气息。

我最后一次见到史蒂夫，是在那年新年刚过不久的傍晚。我刚从欧洲旅行回来，他在前院修剪植物，神情温和。夕阳透过稀疏的竹叶照在他发白的头发上，像给他镀了一层浅金的柔光。

我递给他我从葡萄牙里斯本带回的鱼罐头。他笑了笑，说：“谢谢，下次我请你喝茶。”那成了我们最后一次对话。那一天的风很轻，落日像是在替他说一个温柔的道别。

几个月后，有个年轻人从他家里走出来。我问起史蒂夫，毕竟那阵子已经许久没见他散步了。那人告诉我，史蒂夫已经被送到加州中部的一家疗养院。医生诊断他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开始一点点碎裂，像被风吹散的纸片，有时清醒，有时又陷入漫长的沉默。

我请那人代我问候，但心里明白，也许在他脑中，关于我的那点记忆早已模糊，甚至消失。

后来，我听说他在那里，每天都坐在窗边，看远处的橘园与落日。偶尔伸手在空气里轻轻抚摸，仿佛在整理那一排排只有他自己看得见的花盆。护士说，他依旧喜欢轻声哼歌，声音薄得像风吹过草叶。

也许，在他心里，那座花园从未消失。

史蒂夫是个寡言的人。我们认识十多年，谈论最多的，不是人，而是植物。他喜欢竹，喜欢蕨类，也喜欢些奇异的多肉。我们家的几株仙人掌，就是他送的。

“植物比人诚实，”他曾说，“它们不会假装快乐，也不会隐瞒衰败。”

三十多年前，他是公司派驻亚洲的高管。他花盆上的小木牌上写着各种语言——中文、日文、泰文……那是他年轻时在亚洲留下的印记。他曾在东京、曼谷、香港、中国辗转许多年，带回无数记忆，却没带回伴侣。我一直不明白他为何晚年独身，毕竟许多在亚洲工作的外籍人士最终都会娶个当地妻子，让余生不至于如此孤单。

史蒂夫从未提过家人。他总是独来独往，像一株孤独却坚韧的竹子，自成安静的世界。

他去世那天，是深秋。天空灰蒙蒙的，风有些凉，街角的银杏叶铺满了地。我路过他家时，看到工人正在搬运家具。屋里空荡荡，阳光透过百叶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格影，像他生命最后的呼吸。

我忽然想起几年前的一个清晨——那时他正蹲在院子里修剪竹子。我经过时，他抬头对我笑着说：“植物知道什么时候该生长，也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

当时我没放在心上。如今再回想，那句话像是一种隐秘的预言。

他的房子很快会被售出。新的住客会在这里种上新的花，他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这片泥土里曾静静埋着一个老人二十年的时光与温柔。

而我偶尔傍晚路过那里，风吹过树叶的声音，仍很像他轻声说话的语调。我会忍不住停下脚步，仿佛又能看见他坐在窗边，阳光顺着肩头滑落，尘埃在空气里慢慢漂浮，闪着细碎的光。

史蒂夫在秋天去世。当最后一片叶子离开枝头时，他也随风离去。他像那片叶子——安静、轻盈，被带往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没有记忆的崩塌，没有孤独的夜，只有植物、阳光，还有永不凋谢的宁静。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养老院往往是人生的最后一站。我想，我大概也不例外。

在这个国家，人们习惯把老病交给制度，把余生托付给专业护理。孩子们有自己的世界，城市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把所有人卷进各自的忙碌里。

等到暮色缓缓降临，一个人最终的去处，大多不过是一间不大不小的房间，一扇始终半开的窗，窗外是修剪整齐的草坪与不远处永无止息的车流声。

我常常想，那或许就是我老去的方式——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慢慢被时间磨钝，被生活放轻。

没有戏剧性的转折，也没有激烈的挣扎，只有无数个寂静的黄昏，把往昔的日子翻给自己看。

在美国，这种结局既不悲伤，也不荣耀，它只是大多数人的命运——一种像潮水一样规律、不可逃避的归处。

也许，我会带着对世界未熄的好奇，带着年轻时留下的那些碎片——记忆的光、爱过的人、受过的伤、走过的路。然后在某个傍晚，轻轻关上生命的门。

我不抗拒这样的未来。那既不是失败，也不是放弃，只是生命的另一种方式。一个在异乡老去之人的，最终落点。

岁月如河，流经青春的岸、命运的岔口，也流过我们彼此告别的背影。那些走过的路、住过的城、遇过的人，以及那些不经意的瞬间：一段友情、一场离别、一声叹息、一次回眸——终成生命中最闪亮的碎片。有的真实，有的虚构，有的真假交织。

那些被时光温柔拾起的记忆

以数个主题展开：流年与命运、禁与惑之间、远方的风向、落叶的余温。每一个篇章，都是时光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人心的温度与命运的流转。这里有少年的梦与彷徨，有成人的爱与失，有生命的无常，也有记忆的安慰。文字温柔而克制，如风中落叶，带着时间的香气，轻轻飘回心底。读着读着，也许你会发现：

这不只是我的故事，也是你的。

我们都在岁月里拾起碎片，拼凑出一个关于爱、离别与重逢的世界。